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雏鹰文库

—学生成长百卷读本(93)

国外学生生活(上)



国外学生生活（上）

洋女孩，中国心

姜杰一边进晚餐，一边思念刚才于归途中遇到的那位金发女孩儿。晚餐是简单的：两只烧鸡腿，十多片生菜，一罐茄汁黄豆，一盘白米饭，留学生准备的饭菜，一般都不复杂。节省时间嘛，而且过去在家时，也很少有亲自下厨的机会。“她的笑真甜！”“她大概也在念华大吧！”看她一身学生装扮，他在回忆着：T-shirt 配牛仔裤，曲线玲珑。

姜杰用手提着一只鸡腿，放在嘴里撕咬，活像银幕上的罗马皇帝，好不威风！可惜鸡腿没有熟透，靠近骨头处还有一点赤红。他本想把鸡腿放在烘炉里再烘一下，可是转念一想，算了，美国人吃牛排，血淋淋的也照吃不误，这一点不熟，算得了什么？

“不过，家里妈妈弄的烧鸡，肯定不会有这种现象。”姜杰想起了妈妈，还有爸爸和两个妹妹。他抬头望了望窗口的月亮，心想：“他们现在大概也在吃晚饭吧？”他忘了新加坡和西雅图两地的时差。

爸妈多么渴望能够全家移居到美国来呀！当姜杰两个月前接到被华盛顿大学录取的消息时，全家人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妈妈还喜极而泣哩！因为第一步成功了，再过三年，姜杰取得学士学位，就能在美国找工作，申请永久居留权，然后设法将全家移居过来。爸常说：“我们这些精通英文的人，最喜欢移居西方国家，最理想的就是美国。”

“新加坡这么小，留在那儿有什么前途？还要逼我们讲华语、讲‘抓几’，真无聊！”虽然被逼选修华文作为第二语文，他根本不把这科放在眼里，每次考试拿零蛋，他也完全不在乎。他早就听人说过，方块字艰深难懂，华族文化落后几世纪，又不能靠它赚钱。反正他家里的人，一个方块字都不认识，一句华语都不会讲，还不是照样可以过得很舒服？

姜杰愤而一侧身，看见刚才自己置于桌上的一张镶好的波士卡照片：矮而壮健的个子，烫过的头发很长，眉目还相当清秀。姜杰满意地笑了。

他抓起一块生菜，折而为二，沾了沾鸡汁，塞进嘴里，哇，好味道！

“美国的女孩子真漂亮，”他想，“笑得多可爱，看到陌生的男生，也会微微一笑，开心死了。哪像新加坡的查某，一点都不大方，以为对男生露齿一笑，就是表示爱上他，真是落伍，一定是 China man 的什么传统思想！”

“她是主修什么科的呢？”

姜杰又想起那位金发女孩子来了。她的甜笑，她的披肩秀发，以及她那健美的身材，令他无法忘怀。

第二天黄昏，姜杰又碰到那个金发女孩子了。她独自一人像是刚从学校回来。她照样对他嫣然一笑，笑得好甜好甜。姜杰赶紧抓住机会，向她“嗨”了一声，一颗心七上八下地狂跳着。两人就站在路旁的草地上，闲聊起来。双方都不敢大意，非常客气。

原来她是硕士班的学生呢，再过几个月就可以毕业了。姜杰也把自己的情况，略为讲了一下：他是学航空学的，才一年级，因为在国内服完了两年半的兵役，所以年纪大了一些。他还告诉她说，毕业后打算在美国留下来，希望和她……和她……做个好朋友。

她抿嘴一笑，用胶鞋踢着草地，两只大眼睛，眨呀眨的。“你可以教我华文吗？”女孩子忽然用华语问话。

姜杰大为震惊，一时语塞。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洋女孩怎

么会讲华语呢？过了好一阵，他才期期艾艾地回答：“我……我……我不懂华语。”

“什么？不懂华语？你不是新加坡来的华人吗？”金发女郎似乎更为震惊。

“是的，但我从来不学华文，华语也不讲——噢，你怎么会讲华语呢？”

“我是在东亚语文系念华文的，刚从台湾回来，在那儿住了半年。我本来在外交部工作的，现在请假专心修读华文——我原来还想请你替我补习华文呢！”

姜杰有点汗颜，尴尬地问：“奇怪，你为什么会去学华文呢？这种语文很难学的呀！”

“不会呀，我觉得华文很漂亮，只要肯花时间去学，不会难呀——你怎么可能不懂华语呢？”她惊讶地反问，把长发甩到脑后。

“学华语是沙文主义！”姜杰自以为找到了美妙的答案。

“怎么？华语应该是你的母语吧？学母语也是沙文主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略停一下，甚为不解：“世界上哪里有正常人不懂母语的？你有没有听说过法国人不懂法语，俄国人不懂俄语，日本人不懂日语，韩国人不懂韩语？”

“……”姜杰觉得她讲的话，不无道理。他很想找出一些反驳的论据来，但是无论如何想不出。

“我要走了，再见！”金发女孩子似乎完全没有和他继续交往的意思了。她脸现不悦之色，很失望地走了，但是走前没有忘记报给他一抹微笑，笑里充满了不解和鄙夷。

金头发与中国话、黑头发与美国话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你和我也许无语以对，说不出什么了。也许我们只会彼此在心底说，对母亲的爱恋，对祖国的热爱是世界人民相同的，它没有国界，没有地域之分。尽管一生会浪迹天涯，可落叶终要归根，别忘了，我们共有一颗中国心。

轮椅困境

查利进入大学的第一周，一天去图书馆会见一个人。进了图书馆后，他来到电梯前，按下按钮。一会儿门开了，查利坐着轮椅进了电梯，电梯的门随后关上了。他本指望按钮在他前面的下方，却突然发现它们在他身后，而且高得够不着。查利陷在电梯里，孤独无助。后来有人从四层上了电梯。可此时他已等了 15 分钟了。

在大学里许多地方残疾人都无法去，受此之苦的不只查利一个人。他所就读的肯塔基大学目前有 12 幢大楼，坐轮椅的学生是无法进入的。像图书馆那样的许多建筑物虽进得去，但里面的电梯，残疾学生却不能操作。这些建筑物给残疾学生造成了种种不必要的困难。比如一位残疾学生要见一位行政人员，必须约好在一个出入方便的地点见面，因为坐轮椅的学生进不了行政大楼。约个时间不成问题，问题是体格健全的学生可以随意出入行政楼，而残疾学生却不行。残疾学生虽进得去吉利斯楼，但只能待在一层，无法上楼，要上楼甚至得按下按钮让人下来帮忙。此外，残疾学生要想去就业指导中心得到咨询，他们必须约好与某人在另一个地方见面。由于额外的麻烦，有些学生便不能享受中心的服务。

许多建筑物虽可以进入，但里面的电梯、饮水喷嘴和门把儿却让残疾学生无法使用。例如图书馆和白厅教学楼电梯里的按钮都太高，坐轮椅的学生不得不请别人替他们按。如果周围没有人，残疾学生只有坐等。使用化学物理楼的电梯需要先拿钥匙，坐轮椅的学生只好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找人帮忙。许多饮水喷嘴也使坐轮椅的学生无法接近，有些楼里只设有一个可供残疾人喝水的喷嘴。另外，几乎没有一座楼里的门把手可让胳膊和手有伤残的学生操作。

许多宿舍楼残疾学生也根本无法进去。残疾学生要想进宿舍楼看个朋友或参加个聚会，必须有人把他们抬上台阶。尽管有些宿舍楼的一层有公寓房，但残疾生不能住，因为他们无法使用洗澡间。

既然这么多的地方残疾生无法出入，很显然需要大规模的改造，这需要许多资金。办法之一是使用学费。倘若从每个学生的学费里抽出 2 美元，每学期就几乎有 5 万美元可用来为残疾学生改造设施用。学费已经被用于许多用途，包括教师的薪金和开办校园广播站。只要从学费正在支付的项目中抽出一些钱，就不必提高学费。这并不是一项永无终止的开销，因为每学期抽出 5 万元，所有必要的改造 10 年内便可完成。在那之后从学费中提取的资金可以降到每人 50 美分，用于维修校园内残疾学生的设施。这项计划切实可行，更重要的是这是合乎道德的。如果我们学费的一部分可以用于设立广播站，当然也可以用来使校园变得让残疾学生出入更加方便。或是开办电台播放各种音乐，或是使校园成为一个所有学生都进出方便的场所，这两者哪个更重要呢？残疾生常常要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就，才能证明他们的能力。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一次机会，他们不应被高不可及的按钮、粗糙的地板或台阶剥夺这种机会。

美国，你是学生的天堂吗

在美国，州和联邦政府都大肆宣扬支持教育，父母每天都在强令自己的孩子去上学；教师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在帮助他们的学生。但是所有这些努力似乎难以见效，结果常常令人沮丧：全国的学生退学率不断上升；缺乏实际知识的高中毕业生比例也在上升。这是一个真正的危机。

曾有过一个学生，他的家庭经济状况面临难关。他们家住在一套很小的房间里，没有可供孩子学习或玩耍的地方，父母经常当着孩子的面为了钱而吵架，使这个学生感到灰心丧气。他的内心充满恼怒和忧郁，在课堂上已无法专心听讲，最后在上五年级时他决定退学。他告诉老师他母亲正在找人为他联系一个全日班的工作，听后我大吃一惊，而这名学生却感到无比的激动，因为那个人答应为他找一个每月能挣 400 美元的活。对一个 9 岁的孩子来说，每月挣 400 美元的确算得上一笔大数目了。如果美国学生到了某一年龄都能靠送货或是干点别的什么活挣到他们所需的“足够”的钱，那时你再跟他说，呆在学校里学习到毕业，将来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还能相信吗？至少，在他们急着要去挣钱时，他们不可能聚精会神地听课，要不然就会整天又要学习又要干活，弄得自己精疲力竭。

不止一个学生在抱怨，到学校上课简直是浪费时间。美国的孩子们有那么多的校外活动和娱乐消遣，他们感到做课外作业和到学校上课都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他们只考虑今天的生活，不为将来发愁，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用不着为未来犯多少愁，社会上到处都有成人阅读规划和职业培训班。在亚洲国家，年轻人对他们的前途就常常忧心忡忡。亚洲的青年人，即使只想获得一份很简单的工作，也不得不在学校里努力学习。然而，在美国，生存似乎并不显得那么困难。

还有一个男孩，他从高中退了学，在麦当劳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当他的同学正在为大专院校的升学考试而努力拼搏时，他已积累了不少的工作经验。几年后，当他以前的同学带着他们的大专学历到处寻找一个起步的职位时，他已被晋升为麦当劳总部的中层管理人员了。他并没有靠贩卖非法毒品暴发致富，他只是退了学，找了份好工作，并取得了成功。他实现了他的梦想。有了这个例子，美国的学生自然就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呆在学校里呢？”

感受艰辛

这是一个美国大学生步入大学后坚强自立的一段历程，相信它对每位将来要走入大学的中学生朋友都会带来一些启示的。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坚信一句话：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让我们一起细细地聆听吧。

我已踏入了长长的大学旅途，在未来的4年中我将把学校称作我的家。但当我这样做时，我对所面临的挑战却没有丝毫的准备。我离开了家，离开了兄弟姐妹，离开了父母，他们在过去的18年里一直养育和袒护着我。我离开了我所有的需求都有人照应的地方：吃的、穿的和医疗费用。我在中学遇到的仅有的难事儿就是得付汽油费，花电影票钱，还要花钱买我特别喜欢的新CD盘。我在家里活得轻松自在，而且认为理所当然。

到达校园的第一天，我就经历了未来4年中的我会尝到的滋味。校方告诉我说我的学费尚未支付，在把学费补齐前，我不能搬进宿舍。由于我身边没有父母的帮助，我生平第一次必须独立处理一项棘手的资金问题。我父母不怎么支持我上马里伍黎大学，因为他们付不起学费。直到最后一刻我申请的贷款得到了批准，才使我能有钱上这个学校。于是在我开出一纸把我的存款几乎全部提出的支票后，我搬进了宿舍。我顺当地搬入了新家，把当时的学费也付清了，顿感松了一口气。但我的轻松感稍纵即逝。我很快便发现，虽然我不必付取暖费和水电费，但其他所有费用几乎都要支付。我指的是伙食、电话费、汽车保险、有线电视及所有的必需品。如果不打工，我是绝对支付不起的。幸好我有资格半工半读，但每周35美元实在难以维持。我深感绝望，债台越筑越高。我极不想求助于父母，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没钱，但我别无选择。

我爸爸答应借给我一点儿钱，并允诺只要有钱就随时寄给我，帮我度过难关。到目前为止他一直说话算数，这对我帮助很大。我妈妈则更实际一点，给我寄食品、药品和其他必需品。圣诞节时她甚至还为我购买了崭新的防雪轮胎，因为她晓得我自己永远买不起。父母的帮助减轻了我经济上的一点负担，但我要想象在中学时那样大手大脚地花钱为自己买东西，恐怕还要过很长一段时间。

我进校已3个月，每一天都是一场战斗。尽管我的贷款申请被批准了，我仍需要钱修我那辆总是抛锚的车，支付与日俱增的电话费及购买食品以避免挨饿，因为有时我赶不上食堂的饭。我在未来面临的另一场战斗是还清我上这所大学所申请的所有贷款。有时我想这样借钱和一分一分地节省是否值得，但又意识到如果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就指望挣足够的钱在现实社会中求生存，将是痴心妄想。

总之，我坚信我现在在大学里所经历的经济上的压力，最终将使我在未来懂得如何掌握收支平衡，并能支撑起一个家庭。

名古屋大学的钥匙盒

从日本回国已过3个月，经常萦绕于脑海的既不是和式餐馆桌上蘸着酱油加芥末吃下的生鱼片，也不是不以时速210公里为满足的新干线铁路系统，而是我作访问学者时的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研究室的钥匙。

去日本访问，刚到文学部时，是由日本教授带着去的。去时已有人，没去想大家怎么进的研究室。有一天早晨我先到，三层东洋史学研究室的六间房内皆无人，门紧锁着，我只好站在走廊中间等着。等了有20多分钟，来了一个人，个不高，挺友好，他见我等着，问了声好后，马上招呼我随他下楼。后来他自我介绍说他是研究室的院长，韩国人，叫安都根。我想，这个名字好记，1909年在我国哈尔滨站刺死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朝鲜爱国志士，就是叫安重根，仅一字之差。

来到学部一楼楼梯口，推门走进大门右侧门房，这是一间传达室，靠墙是一面大柜，像我们国内的信箱柜，横竖几十个小箱整齐排列其中，每个箱各有一扇小玻璃门，又各挂着一把号码锁。透过玻璃看到里面有一个个沉寂的钥匙盒，打开锁就能够取出里面那个盒子。为预防错乱起见，每扇门下贴有标签，写着某某研究室的名字。一个学部几十个研究室的钥匙全在这里。

安先生走上前去，手握东洋史学研究室标签上的号码锁，低声告诉我暗号是“2670”，按下这4个数字，开锁就可取出钥匙盒。他这么说着做着，在传达室里登记，然后我们手端盒子，上了三层，取出一串钥匙，打开了我们想进的院长读书室。安先生还告诉我，每天谁最后离开研究室，在检查各房门是否关好之后，下楼再将钥匙盒顺便锁进传达室的柜箱里。

日本大学之下设学部，学部之下设研究室，所有教学研究活动都立足于研究室。每个研究室按学科设立，相应资料分置在几个房间里。我所见到的书，从线装书到考古发掘报告，从汉文书到和书再到洋书，从书籍到报刊，均供大家自由取用。我是一个外国人，专门来东洋史学研究室搞课题，知道如何取钥匙盒开门后，一年之内无论哪一天，国家公休或者“三连休”，学校四季放假或者“秋祭”活动，在文学部规定的每天8:00—22:30，我都可以自己取钥匙上楼查资料写作，从不为钥匙之事找人等人。即使是日本教授的研究室，也可以开门取书，而不必忌讳他在或不在。

一个铁质的盒子被用来放钥匙，被用作体现学校管理制度的一种器具，这种习惯被人们自觉地遵守着、执行着。这种铁盒结实，有棱角，还有些分量，其他地方并不是找不着，但是要同样去做，还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我不是日本大学研究室的主人，却深感那里自由取放钥匙，为的是给人以方便。这样做有无副作用，我不清楚，但我想，在日本那样讲效率讲便利的国家，只要是利大于弊，事情就会被坚持下去的。

在哈佛上的第一堂课

大家都知道哈佛用实例法教学。前一天我们领到了第一学期的教材，每门课的教材由几十份单行本组成，每份单行本就是一篇实例，但是实例法究竟如何教法，对我来说却是个谜。第一天，当我清晨 8 点来到教室时，已有一半同学坐在那里了。教室里灯火通明，没有窗子，座位呈马蹄形排列。

8 点 25 分，全班 90 位同学到齐。

8 点 29 分，教授进入教室。

8 点 30 分，上课开始。

第一天第一堂课是市场营销学。实例是就费尔德毯子公司的新产品展开讨论。教授首先介绍毯子的品种、销售渠道及市场竞争，接着介绍新毯子的特点。然后说明毯子通过百货公司和大众用品商店两种不同渠道的销售情况，并讨论顾客选购毯子的心理。最后要求学生提出一项营销方案。方案中要包括价格、利润目标、包装、设计、广告、经销渠道等多个方面。文后附有 8 幅插图介绍费尔德毯子公司的组织机构，以及各种毯子的品种、颜色、零售价、批发价、成本与其工艺特点。全文长达 24 页。

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市场营销学的人来说，这大量的信息似乎是一团乱麻。没想到推销一条毯子竟有这么多学问。

第一堂课的气氛特别紧张。显然，每个同学前一晚都读过这篇实例，而且都作了准备，但没有一个人此刻心里感到踏实。教授似乎在一个一个地打量着学生。他缓缓地环视一周后，终于望着一位同学说：“桑德斯先生，请你分析一下费尔德毯子公司的问題。”顿时，其他人都松了一口气，桑德斯稍稍愣了一下，便开始发言。他分析了毯子的市场、顾客的心理，又探讨了新产品的潜力、经销者的手法，最后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他的声音响亮清晰，只是稍显急促。桑德期刚讲完，至少有 20 个同学立即举起手来。实例讨论就这样开始了。

实例教学法是哈佛经理学院的传家宝，每个实例描写的都是工商企业遇到的真实问题。有的实例似乎是从一个将军的角度叙述整个战局，有的则记录一个十分模糊片面的印象。有时实例故意不给应有的信息，有时又故意多给一些。实例的最后，总是问：“你说该怎么办？”

实例法的精髓不在于让同学强记内容，而是迫使我们开动脑筋思考，苦苦地思考。当然不是无休止的思考，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得带着行动方案去上课。其实现实世界也往往如此，我们不可能掌握一切应该知道的信息，有价值的信息又常常混杂在一大堆纷乱的信息之中。现实世界中多半没有一种精确的答案，却有受时间、资源、人才等条件限制的多种选择。实例法训练的是决策的艺术，意在锻炼学生在不圆满的条件下作出决策的能力。

实例法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学生的质量。经理学院将新生分成从 A 到 I 的 9 个班，每班 90 人，有固定的教室，按同学的背景、经历、特长、兴趣配组成班，我被分配到 H 班。我们班上有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牙买加、法国、韩国、哥伦比亚、津巴布韦等 9 个国家的学生。其中有参议员的子女，有已获博士学位的理科生，有奥运会运动员，有西点军校的教官，有税务律师，有会计师，有银行家，有工程师。

无论学生过去学的专业是什么，第一年的课全是必修课。内容有会计学、管理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写作讲演学、组织行为学、生产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企业战略、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管理模拟竞赛。哈佛的节奏是紧张的，也必须如此。要在短短两年里培养出总经理式的人才，谈何容易！哈佛教育的价值在于：把通常需要多年工作实践才能获得的经验浓缩到两年的课程里，将涉世不深的学生“催熟”。

在两年里，我们要分析 800 个实例。一篇实例短则一二十页，长则三四十页。每星期一、三、五上三节课，二、四上两节课。除了实例外，还发给我们与实例有关的背景知识、理论说明等参考资料。阅读分析一篇实例至少需要二三个小时。

经理学院的评分，有一半取决于上课发言，另一半则视考试成绩而定。极少有书面作业。上课发言不仅重质重量，而且讲究时间性。满腹经纶，准备得再好，如果教授没有请你发言，就只好按兵不动，坐失良机。老师是否容易看到你举手，在一定程度上要看你坐的位置。

经理学院没有专门为学生提供学习、生活、择业等方面的心理咨询。咨询服务处的校医每年大约接待 700 多名学生。上课发言感到困难是学生“就医”最普遍的原因，新生要是到了开学后第三个星期还缄口不言，恐怕就需要一些心理治疗了。第二年最普遍的就医原因是考试引起的焦虑和失眠。考试前失眠或焦虑本属正常，但过度忧虑，惶惶不可终日，则是犯了心病，得由 MAB 咨询服务处的心理学专家开一贴心药。心病和其他疾病一样，越早发现，越早就医越好，即使是杯弓蛇影，一场虚惊，那也无伤大雅，因为保密是医德。

不过，不管求什么心理学家的指点，哈佛经理学院恐怕终非神经脆弱者的安乐窝。

德国青少年一瞥

德国青少年是多层次、多色彩的，兼具种种截然相反的特点。有些青年既爱淘气、又注意不妨碍别人。在街头经常可见奇装异服的“朋克”或者三五成群的女中学生在嬉戏，有的青少年在行人道旁拿大顶，但他们并不妨碍他人。如果陌生人前去提问，她们立刻会停止打闹，规规矩矩答问，决不撒野或报以恶言。与我国的青少年相比，他们趋于早熟，更自信，习惯于自立。在假期里，11、12岁的学生就三五人结伴，自背行李外出徒步旅行，稍大的甚至去外国旅行。他们的学业成绩很可能不及我国的青少年，但知识面广，特别是生活知识，显然丰富得多。他们对家庭的依附性小得多，年满16至18岁，就认为自己可以对自己负责，可以有自己的见解。我认识的大学生，有些人的家庭是富有的，但他们在经济上都自立。进大学时，父母送给他一个较昂贵的生活或学习用品，如摩托车、电脑，但在平日生活中，他们不再向父母要钱。人们或申请助学金、或打工，包括干重活、脏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已经成年，得靠自己，再向父母伸手没出息。”

青少年吸毒的事件，时有所闻。我未接触过吸毒的德国人，只能根据报刊的报道和人们的议论谈一些感受。吸毒主要存在于大城市，较闭塞的地区则少见。吸毒成瘾不能自拔的人只是极少数人，而出于好奇“体验”过的则比较多。吸毒极端隐蔽，父母即便吸毒也瞒着子女；子女吸毒也不让父母知道。社会厌恶和反对青少年吸毒，发现青少年吸毒，政府要强行干预，采取措施使其戒毒，包括送教养院。教唆青少年吸毒者要受法律惩处。

“我讨厌这种作业”

11岁的萨拉已经精疲力竭，她手中的笔往英语课本旁边一扔，说：“我讨厌这种作业！”像这样繁重、乏味的家庭作业使学生和家长苦不堪言。

课本上有这样一个句子：“Does she hear his brother in the Kitchen？”真见鬼！动词为什么少个“S”，这可是第三人称呀！这位六年级的女学生对这个问题一筹莫展。

不过，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萨拉并不是一个人待在家里做作业，而是坐在“学生辅导”公司的课堂里。这个公司是德国最大的辅导公司之一。这时，28岁的女辅导员西尔维阿·戈尔德走过来向她解释：改用“todo”，“S”移到助动词上去了。萨拉明白了，点了点头。当这位女教师转向另一位弄得晕头转向的女生夏埃拉时，萨拉又被练习中的另一个句子难住了。

辅导教学活动在德国已遍及各地，仅“学生辅导”公司在德国就有575个分公司。四五个孩子被划为一组，到公司的课堂去上辅导课，每周上二到五次，每天下午上一个半小时。

“在这儿，学习上的问题全可得到满意的回答，”萨拉说，“这给了我一种安全感。”她的同伴米夏埃拉附和说：“在小组里做作业，有时甚至使人感到愉快。”

做家庭作业会愉快吗？80%以上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认为，愉快不过是幻想。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只有17%的家长让孩子自己去“啃”家庭作业，其余的家长不得当“后盾”，帮助孩子解决作业问题，他们或进行辅导，或作些解答。10个家庭中就有一家抱怨说：家庭作业是在全家唉声叹气中完成的。”住在汉堡的女教师洛特·布施说，家庭产生了不和，因为“家庭作业引起了家庭的灾难”。

孩子们有强烈的不满，孩子们在学校里上了六节课后，还有许多家庭作业等着他们去伏案完成。例如，做了《抽烟者的角落——对不对呢？》这篇作文以后，要完成英语翻译，再做5道二次方程式的代数和复习两页拉丁语单词。这些作业往往会占去他们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

据调查，10至14岁的学生在学校和家里的苦读，每周要花50小时，而大众汽车厂的一名工人不久之后每周只需工作28.8小时就行了。

“孩子们的负担经常过重，”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说。早在她的儿子9岁上学时，她对此就深有体会。她说：“按照教师的要求，这些作业得在半小时之内完成，但这些时间远远不够用！”

念小学的孩子们做两三个小时的家庭作业，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一位妇女说：“要不是我在后面紧逼，克劳斯怎么也完成不了。”她的儿子正在念小学四年级。她说：“我好不容易把他叫到书桌旁边，多半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这时候，他说肚子饿啦，闹口渴啦，接着又要上厕所。如此这般，没完没了。于是，我不得不控制住自己，免得自己患上‘叫喊痉挛症’！”

当母亲的为了孩子做作业，少不了要连哄带骂，或者花言巧语，或者关孩子禁闭，或者极度忍耐，或者愤怒绝望，还不得不忍受孩子对学校一连串的抱怨。

孩子们垂头丧气，闷闷不乐，因为那些所谓的“习题”既乏味又费神，把他们下午的时间全给占掉了。例如：要做五组乘法题，每组又分四个小题；或者用动名词造十五句拉丁语句子；或者把“我一定认真做家庭作业”这句

话写上五十遍。

“这种做法是没有意义的，也是多余的。”默勒太太抱怨说。她这么说是合情合理的。早在1959年，就有一份调查报告表明，这类“习题”对促进学习收效甚微。不过，时至今日，90%的此类问题还要求学生去做，许多家长依然盯住家庭作业，有不少家长甚至同孩子一起拼命做家庭作业。有的家长是出于过分的虚荣心，但大多数家长是迫不得已，他们不这么干难以帮助孩子，因为如今孩子所学的许多东西，同自己过去学的内容完全不同，有的甚至没有学过。

令许多家长头痛的是数学中的集合论，这简直使他们束手无策。为此，许多学生的家长就去上业余大学，以便更好地帮助子女。家长们经常检查、修改和亲自把数学答案写在孩子的作业本上，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心肝宝贝在老师跟前出丑。

心理学家鲁尔夫·屈恩对514名四年级学生进行调查后指出，家长的辅导往往使学生的成绩下降。他发现，“在许多情况下，严格的管束和监督”以及“母亲对孩子过大的压力”，限制了孩子的学习自主性。他的结论是，过多的干预只会帮倒忙。何况在家里完成的作业本是让教师来了解学生真实的知识水平的。

学生中曾流行过一种说法：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得刻苦学习。要是没有满意的成绩，就会被父母送到补习班里去补习。

有一篇研究报告表明，每5个12至17岁的学生中，就有一个被送去上补习班，补习时间平均为9个月。这些学生在补习学校或私人教师那里每周补习两小时，主要是补习数学，也有语言和自然科学。这就是说，近350万名高小学生中有70万名在智力上是让人“喂养”的。

据推算，学生家长为了孩子补习，每周得支付2800马克，每年超过10亿马克。

事实上，学校越来越多地把自己不再抓的工作，推给了家长和辅导教师，其中原因是：

——课堂教学越来越困难，因为越来越多的孩子思想不集中、过于活跃或者有好斗性。电视消费的冲击、离异的家庭、学生间使用粗野语言，这一切都给教师造成了困难。

——为了减少教学人员而增加了班级里的学生人数。班级里学生人数越多，教师越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们不再能照顾到每个学生。

——教师经常感到精疲力竭。教师身体的劳损现象时有出现。他们必须同日益增多的心血管疾病、支气管炎、偏头痛、胃溃疡和虚弱的免疫功能作斗争。

不入军校誓不休

“亲爱的福克纳先生：

我很荣幸地通知你，西特戴尔军校校务会经研究决定，同意您临时入校学习。”

对高中生香农·福克纳来说，1993年1月份收到的这份入学通知书，无疑是值得庆贺的。不过，信中有个小错误，即香农是一位小姐，并不是先生。

在西特戴尔军校151年悠久的历史中，从未允许一名女生入校学习。军校发现这件事出错后，无意打破传统，决定收回成命。然而，香农·福克纳小姐同样不愿让步。在得知入学通知有误后不久，她对位于南卡罗纳查尔斯顿的这所军校提出起诉，控告其性别歧视。很快，一些生怕女生进入西特戴尔军校的人们发起反击。1993年12月，福克纳发现一堆垃圾被丢在自己的汽车上，此后她家住房遭到鸡蛋袭击，信箱也被砸烂。更有甚者，一个西特戴尔军校毕业生在饭店里看见福克纳，把戴着校戒的手举到她面前，示威般地大喊：“你永远戴不上它！”

面对种种骚扰，福克纳保持平静。“这无法伤害到我，”她说，“支持我的人，比反对我的人更多。我决心坚持到底。”

福克纳仍信心十足。终于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美国第四巡回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的裁决，要求西特戴尔军校允许福克纳参加日间课程，至于福克纳控告该校排斥女性有违反宪法一条，尚有待判决。然而，1994年1月12日，正当福克纳在军校注册之际，美国最高法院准许西特戴尔军校延缓执行判决，入学之事遂再次搁浅。“我不知前景如何，”19岁的福克纳说。按原计划，她将于1月中旬和1900名男生共同在军校上课。“希望他们看到，那里的一切不会因为我的出现而有所改变。”

福克纳这位热情开朗的少女和西特戴尔军校的传统交锋，时间已有一年以上。这桩深受世人瞩目的纠纷是自福克纳接到最初的入学通知书后的第19天开始的。那时，军校显然已得知福克纳的性别。军校给她来了第二封信，信中指出：“本校日间课程专为男性设立，因此你无权入学。”香农·福克纳认为是以前的一个高中同学向军校“告发”了自己的性别。

1993年8月，在28岁的律师苏珊纳·科的帮助下，福克纳得到法院通知：军校在案件宣判之前应允许她入学上课。然而，西特戴尔军校在上诉法院得到了紧急延缓执行令，成功地阻止了福克纳于秋季入学。据说，该校男士官生们闻讯后欢声雷动。结果，福克纳暂时去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学习，但没有放弃斗争的决心。“我认识到，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她说，“我代表着全州的每一位女性。”

西特戴尔军校则认为，应为单一的男子学校留有一席之地。“在同一性别的环境中，成长发育阶段的青年会表现得更好，”西特戴尔军校校长克劳迪厄斯中将说。福克纳则认为：军校28%的财政预算来源于州政府，既然接纳了纳税人的钱财，那么更无权阻止女性入学。据统计，该校1993年接受州财政拨款达1240万美元。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是唯一的另一家既接受公助又排斥女性的学校，1992年该州上诉法院便裁定，该校要么实施男女同校，要么放弃州政府资助。

福克纳最早对西特戴尔军校产生兴趣还是在上高中时，那时她们讨论了一篇披露军校里老生欺辱新生的文章。“当时我们班上有15名女生，1名男

生，”她回忆说，“我们讲到尽管我们成绩都很出众，但只有一个人可能入西特戴尔军校深造。后来，我们又谈到军校接受纳税人的钱财。我们都说：‘走着瞧！’”

讨论结束后，福克纳来到教导处，领取了一份西特戴尔军校的入学申请表。经过一个月的研究和考虑，她决定提出申请。“我弟弟托德一年前加入了海军，我发觉他进步不小，”她说，“西特戴尔军校的教育专业力量很强，我很想去攻读。”

入学申请表上没有性别这一栏目，福克纳自然不填，她还请求有关人员不在她的成绩单上注明性别。她的用意是“希望申请被公正地对待”。

除了性别外，福克纳具有一名模范士官生的所有条件。她成绩优秀，是学校年鉴的编者之一；她喜欢打垒球和篮球，是学校野营拉练团的成员。她的律师苏珊纳·科指出：“香农不要特殊待遇，她只想被公平对待。她尽管被西特戴尔军校拒之门外，但从未说过军校一句坏话。军校应该对拥有这样的学生感到自豪。”

福克纳的父亲艾德是一家建筑材料公司的老板，母亲桑迪在一所中学讲授社会学。他们认为，自己女儿香农·福克纳未来是名斗士。“香农是早产儿，早产了六个星期，她当时对食物极度过敏，”桑迪回忆道，“我们认为她活不成但她挺了过来。”父亲艾德补充说。“香农对做不到的事情决不争取。她常常是看一看，便走开。她很晚才开口说话，但一说话就成句成句地说。这一回，她想上西特戴尔军校，我回答说：‘去努力吧’。”

福克纳在静静地等候着最后裁决。她确信，自己会在西特戴尔军校受到欢迎。在查尔顿联邦地方法院今天早些时候作出终审判决之前，如果西特戴尔军校允许她暂时入学，福克纳将根据律师的安排，在校园外的一户人家家里借住。“如果公正的法律能起作用，那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她充满自信地说，“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士官生，一名最优秀的士官生！”

“软绵绵的香蕉” ——当今挪威的青年人

大众媒介带给人们的信息是，挪威青年一代好像是“软绵绵的香蕉”，他们对前途悲观失望，自暴自弃，对社会缺乏参与意识。有些青年懒于思考，不图变革，甚至认为：“一切事情过去都有人想过、说过、做过，我们想不想都一样。”

追求实惠的浪潮已涌进挪威，席卷年轻一代。他们与老一辈相比，不重视普通教育中的科学文化学习，对政治和艺术等“软价值”不感兴趣，摒弃节俭和谦虚等传统美德，崇尚个人主义，自我倾向甚浓。挪威青年的群体观念淡薄，独行主义盛行，在职业选择和业余爱好方面表现出讲究实惠和混日子的态度。今天的青年们将来怎能挑起社会重担，又怎能照料好大批即将进入老年期的长辈们呢？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责怪年轻人，因为正是长辈们一直唠叨着，要年轻人与他们保持一致，而不是鼓励年轻人勇于思考探索。况且，长辈们对青年又关心得很不够。他们说，这些青年自降临人世，社会传给他们的信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我们不需要你们，你们是社会经济中令人烦恼的累赘。成长着的孩子们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温暖不够。看看许多孩子进出的那些破烂不堪的校舍吧！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要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几代人之间的团结问题，而团结和凝聚力却不是唾手可得的。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祖国，祖国在他们心目中具有什么价值，这些问题不能不使人担心。

当然，挪威青年中有作为的仍然大有人在，他们关心与我们生存有关的全球问题，有社会责任感，想干一番事业，甚至要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前人的方式干一番事业。

美国学校生活中的重男轻女

明尼苏达州圣波尔市法恩斯庆特小学的女生们愤怒地谈到，她们在别的小学上学时的可怕的日子。在那些学校里，“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男孩子身上。”

12岁的凯丽·帕拉迪说：“当我们提出某个问题时，女老师总是不理我们。”她的11岁的同学珍妮·蒙图补充说：“男孩子各方面都受到优待。”女老师的所作所为令她产生“我是个笨蛋的感觉”。

女教员吉尔·福尔的使命是改变这一切。她说：“在我的班上，我鼓励每个学生参加讲课。”令人遗憾的是，像吉尔·福尔这样的女教员太少了。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联合会的一份报告说：“重男轻女或许是美国学校中最盛行，也是最有害的一种偏见。”

在小学里，老师叫男孩子回答问题的次数多于叫女孩子，对男孩子的鼓励也多于女孩子。男孩子在阅读方面常常需要帮助，于是许多学校开设了阅读辅导班。女孩子在数学方面往往需要辅导，但她们很少有机会在这方面一展才华。男孩子常常由于作业的内容受到表扬，而女孩子往往由于整洁而受到称赞。男孩子高声叫嚷回答问题，不会受到惩罚；女孩这样做的话，就会被认为没有教养而受到训斥。

调查表明，女孩在合作气氛中学得比较好，男孩则在竞争条件下学得比较好，而大多数学校是按照竞争模式建立的。调查还表明，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女孩的成绩还是比较好的，并愿意上大学。但是连成绩较好的女孩对自己能力的信心也不如男孩子那么足。在自然科学方面，性别的差异最大。女孩子一般愿意学生物，男孩子则愿意学物理和化学。据罗德岛的一次调查，64%的中学男生选修物理和化学，并打算将来上大学选学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而相应的女生则只有18.6%。

美国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小学教员是女教员，她们偏向于男生很可能不是故意的。塞德克夫妇在美国各地拍摄了数百小时的录像，研究教员对男生和女生的态度。戴维·塞德克说：“当我们问教员，他（她）最喜欢哪些学生时，回答总是，最喜欢外向型的男生，而最不喜欢外向型的女生。”

一种引起争论的解决办法是男女分校，或者在发育的关键时期实行男女分班。华盛顿市女子国民学校的校长伊涅斯·安德沃德说：“对于大多数女生来说，这是一种十分积极的经历，她们可以得到男女生混同的学校肯定得不到的那种支持。”

在前面提到的吉尔·福尔的班上，女孩子们得到充分的支持。11岁的塔米卡·奥贝特说：“她对我们都一个样。”当然，班上的平等不会使所有的女生都变成物理学家。

美国大学校园的快节奏

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有一幢学生宿舍叫弥尔顿大楼，进出大门的人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着上去像是火车站，而不像是大学生宿舍楼。大楼内的过道景象也相仿，住在里面的大学生来去匆匆，他们进入宿舍房门，扔下 20 磅重的书包，三步并作两步，到餐厅里狼吞虎咽地吃下一碗意大利面条之后，又急忙外出了。有的去上课，有的出去打工，有的去参加一个甚至几个什么活动，有的赴茶会或舞会；其中有的人甚至是挨着赶场子。

弥尔顿宿舍楼拥有 123 个套间，管理人员昼夜值班，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由于大学生接触面广，交往人多，使得管理员们为接待来访客人，查验身份等事忙个不停。门口的一扇门也日夜转个不停，电梯上下穿梭不息。大楼底层有六间洗衣房，房内的烘干机几乎没有关机的时候。有些房间的灯光是彻夜通明的。这番情景给外人一种印象，似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要比美国其他大学学生忙一些。住在这里的一个名叫詹宁的大三同学说，他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所有的功课都是在子夜到凌晨 4 时之间完成的。这所大学许多学生在修读四五门课程外要打两三种短工。尽管这么忙碌，大学生们对于社交活动是难得放过的。弥尔顿宿舍楼内二年级以上的学生有 244 人，下述的是一个星期四到星期五早晨的 24 小时内，这些大学生眼花缭乱的生活掠影。请读者们看看他们是怎样繁忙紧张地利用一天的 24 小时的。

闹钟必不可少

二年级学生汤姆星期四早晨一觉醒来已经太晚了，时针指着 10 点，半个小时以前他就应该去上统计学课的，而今天的统计学课还要测验。他一面跳下床，一面问同住一室的亚历克斯是不是动过闹钟，因为开闹钟的指针定在下午 5 点 35 分。亚历克斯的回答是否定的。于是，他又怀疑起他的女友丽贝卡来，他猜想昨天下午丽贝卡来打过瞌睡，可能是她动过闹钟了。汤姆匆匆忙忙地赶到教室，统计学教授让他在下课以后补做测验。这天早晨亚历克斯是在 7 点钟跳下床的，上午他有 3 个小时的化学实验课，下午的化学课在 12 点 30 分开始，因此他在做完化学实验以后还有时间预习下午要上的课。化学课以后是排球训练、乐队排练和其他课程，一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直到晚上 9 点 30 分为止。亚历克斯和汤姆住的这一层楼面是优等生住的，住在这一层的学生每一学期必须至少攻读一门优等生课程。由于每个周末要参加各种聚会，而通常星期一必须交作业，以致同学们必须在星期天夜晚通宵干。

关心毕业后的前途

就在汤姆一骨碌地从床上下来，头发也不梳就戴上一顶棒球帽出门的时候，21 岁四年级女生莎拉穿一条牛仔裤，套一件红色运动衫离开弥尔顿宿舍楼，去参加历史学教授召集的会议。她说她最近的一次考试成绩很好，但是教授认为整个年级考得不佳，所以要召开会议。她虽然成绩好，也得去参加，聆听教授先生演讲，还得记笔记。

开完全，上完统计学课之后，莎拉回到宿舍准备午餐。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必须把仅有的一只锅子洗干净。她的午餐是意大利通心面条加上意大利调

料。同许多同学一样，莎拉只有睡觉和吃饭的时候在宿舍里，因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在市中心，一有空同学们都到市区各忙各的去了。现在的学生想的都是切身利益和毕业后的前途，不像从前的大学生留恋恬静的校园生活。莎拉吃饭的速度很快，只有两分钟，饭后即离校去“五角城”购物中心打工，工作内容是替一家公司设在购物中心内的展销室推销商品，每周工作三天。除此以外，她还在大学里做一份文书抄写工作，每周两次。

早起晚睡的一群

吉尔伯特，22岁，艾迪生，21岁，都是四年级的同学，属于宿舍楼内最早起、最晚睡的一群。星期四早晨8点，他们上了一堂《如何做领袖人物》的课之后，回到宿舍，脱去身上穿的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制服，就看起来，荧屏上放映的是描绘夏威夷海上冲浪的电影。

这一天还有三节课等着吉尔伯特，他首先必须阅读《美国外交政策》的课本，但是他现在似乎难以从长靠椅上坐起来。他说，他总是想多读一些，课堂上学的东西很枯燥，读起来很费劲。他说，他总是觉得毕业在即，最后还得学各种车辆的知识。吉尔伯特和艾迪生与另一个预备役军官大学生一起住三间一套的公寓套房，合在一起做饭吃。但是从厨房内放着的9只多诺饭店的意大利馅饼盒和14箱啤酒、苏打水空瓶来看，这三个人的膳食主要是电话餐馆和小型购物中心的餐馆送货上门的。每星期四是这三位室友洗衣服的日子，这个星期四晚上正好有一个舞会要去参加，可以穿得干干净净地赴会了。他们与大多数同学不同的是，周四夜晚不能多喝酒，因为周一早7点他们有体操训练课。幸运的是本周五早操因故取消，他们可以到两个街区远的弗里克饭店举行的舞会上开怀畅饮了。次日凌晨3点，三个人才回到弥尔顿宿舍楼，又坐在电视机前一边观看影片《追求正义》，一边吃饭店带回来的中国点心。

四个小时之后，三人中的一个名叫普林顿的肩扛一辆山地自行车乘电梯下楼外出锻炼去了。

决不错过舞会

星期四下午是弥尔顿宿舍楼最安静的时刻，这里的居民不是上课就是打工去了，除了三年级医学预科学生法布伊的房间内飘出一阵具有摇滚乐节奏的宗教音乐外，其他房间都悄然无声。法布伊现在正在宿舍内预习有机化学。今晚他要参加黑人联合会举办的舞会，还想去打一场临时凑合的篮球比赛，而明天上午9时的生理学课是不能缺课的。笔者问法布伊时间安排得过来吗？他说，他心中很明白什么是优先重点和轻重缓急，做任何事情都服从于他为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今晚7点上完有机化学课之后，他打两个小时的瞌睡，然后去参加舞会，跳完舞以后再去健身房打一场次日凌晨1时开始的篮球比赛。今天预定的两个小时的打盹没有实现，因为他要去看望几个同学。尽管如此，他依然精神饱满地参加了篮球赛。

校长的比喻

弥尔顿宿舍楼乱纷纷的氛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校长斯蒂芬先生的眼里丝毫不奇怪，他说：“十八九岁的青年人身上有无穷无尽的青春活力，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当你上了年纪，这样的精力也愈来愈难以得到了。”不过这位校长又说，大学生开始学着组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属于实验性的行为和冒险性的事情，年轻人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他自己的儿子上哥伦比亚大学时，他就对儿子提供这样的建议。他说，美国有一部影片《毕业生》，其中一个关键性词语是“可塑性”，现在学生常用的关键词语是“管理时间”。斯蒂芬校长说，如果你能管理好自己的时间，你就可以做大量的事，你不能落在时间后面一个星期以上。学好一门大学课程就像做意大利阔面条，只能一层一层地擀，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弄得一团糟。

校长用面条比喻学习的大道理是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的。

自救学校

幽静的小路上，花草芳香，充满田园诗般的气氛。一位妇女正慢悠悠地走着，她没有想到会有危险。突然，一个全身裹着黑衣服，头戴假面具的人出现在她的面前，企图把她按倒在地。那位妇女敏捷地作出反应，迅速把袭击者打倒。袭击者从地上爬起来，又走向这位妇女。这一次，他摘掉了面具。原来，袭击者是一位教练员，那位妇女是他的学生，他们亲切地拥抱在一起。

在意大利北方特伦托市的自救学校里，这类突然袭击是家常便饭，是学员们花钱自找的。学员们通过7天紧张的训练，可以学到防身的基本本领。他们能攀援绳索越过深壑，能从烈火熊熊的房子里和沉入水中的汽车里逃生，即使半个身子隐入泥潭，也能爬上来。

7年前，为了传播逃生自救的方法，吉克·帕尔克维奇创办了这所欧洲唯一的自救学校。他说：“遇到危险时，惊慌失措是大敌。惊慌失措往往说明你缺乏环境锻炼，因而产生了过份的恐慌。如果你从未经历过汽车掉进海里的事故，一旦真地遇上了，就很可能因举止失当而被淹死；然而，只要经过一次自救实习，你就能在遇到这种事时安然无恙。一个星期的训练可以大大增强你应付危险的能力。”

帕尔克维奇的自救学校有意使学员们经历各种危险，包括热带雨林、极地、沙漠、高山和海洋中可能出现的危险，并教他们应付的方法。学校还教学员如何趋利避害以增加安全。帕尔克维奇到电影院看电影，往往选择靠近安全门的座位。这倒不是因为他爱把问题朝坏处想，而是他认为小心为上策。他说：“对我来说，采取一切预防措施是自然的事情，如同下棋一样，想多走几步。”

办学初期，自救学校的课程主要集中于如何在荒郊野外摆脱危险，如今，如何在大城市中自救则在课程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帕尔克维奇认为：“大城市是比一切原始森林更有危险的地方，可是，大多数居民并没有学过保护自己的方法。人们往往在出发去荒野之前做好充分准备，因为那里危险丛生；可是很少有人对孩子们和他自己在大城市中面临的危险采取认真的防范措施。”大城市里确实时时处处都可能出现危险。意大利仅1989年一年，就发生了一百多万起盗窃事件，近四万起暴力攻击事件，成千上万的妇女遭到强奸。火灾或者电器及机械事故也常使一些人在劫难逃，一年中有八千多人死于家中发生的事故。人们有充分理由重视大城市的文明生活带来的危险。

帕尔克维奇主张，自救逃生的技巧应当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帕尔克维奇是在德国集中营的一幢岌岌可危的房屋中诞生的。那时，他的波兰父母被抓到德国关在大墙之内。可以说，他从小就有了逃生的愿望。

如今，已经46岁的帕尔克维奇是世界闻名的冒险家。多年来，他一直担任荷兰“暴风之鸟”号帆船的船长，几乎在每次帆船比赛中都取得胜利。他曾单独驾驶一条小船横渡大西洋，也曾徒步穿过印尼加里曼丹岛的原始森林，还骑骆驼闯荡过撒哈拉大沙漠。他最近的一次探险是在1989年2月，乘坐驯鹿拉的雪橇在环境险恶的西伯利亚荒原上，行进一千三百多公里。

这位传奇人物和他的4名教练，只教学员如何应付攻击和强奸，而不教他们如何对别人施行暴力。帕尔克维奇说：“我们的自救学校与美国自救学校不同。在他们那里，很多时间用于学习使用武器和怎样割断对方的喉管。我们的学校是由意大利内政部监管的，学习使用的武器顶多不过是弓箭而

已。”

因此，参加训练的学员不是争强好斗的人。他们多数是普通工人，学生和家庭妇女，一般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某种不安全感，想通过自救本领来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

当然，短短一星期的训练不会使他们马上变成自救的行家，但至少能给他们更多的信心。如果这种训练能防止更多的女孩子被人强奸，那说明办这种学校的方向是对的，这种训练确实有必要。

西点军校点滴

一年中的这个季节，风刮得特别起劲，座落在哈得孙河畔奥索山下的西点军校，显得格外寒冷。平日里总是计算着还有多少天就可以毕业的西点军校的学生们，此时此刻则盼望着好天气能尽快到来。西点军校成立于 1802 年 7 月，因校址在纽约城北哈得孙河西岸的西点而得此名，其正式名称是“美国陆军军官学校”（USMA）。

来到西点军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既像大教堂又像防御工事的新哥特式校舍。西点军校的基本色调是灰色，学生的军服是灰色的，校舍的墙壁是灰色的，运动场的梯形看台也是灰色的。

寒风肆虐。到了中午 12 点，气温才好不容易上升到零摄氏度。曾在西点军校学习，后来成为著名战争将领的巴顿与艾森豪威尔等人的雕像依然矗立在各自己的基座上。西点军校目前有 4400 名学生，200 名教官，没有人不梦想成为像巴顿将军那样的人物。

“服务，荣誉，国家”，是西点军校的校训，已深入到每一个西点军校的人心里。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无缘在西点军校镀金，但他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自己没能在西点军校学习的遗憾和对西点军校学生的羡慕之情。他说过：“西点军校的学生任何时候都是武装部队的最优秀的成员。”

最近一段时间，在西点军校议论最多的人是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他的大幅照片出现在学校宣传栏内和教室的墙壁上，他在西点军校当学生时的照片也被放大后张贴在军校最醒目的地方。

施瓦茨科普夫在海湾战争中任多国部队指挥官，四星上将，身高 6.3 英尺，体重 240 磅，部下都称他为“大灰熊”。在军校时，他最喜欢的科目是军事史，爱钻研亚历山大大帝、恺撒、汉拔尼和拿破仑的传奇式战役，其他课目并不特别用功。他自己也承认，他并非西点军校的优等生。1956 年，他从西点军校毕业，在同届的 480 名毕业生中，成绩是第四十三名。然而，在今天，施瓦茨科普夫的名字已成为美国的军事神话的一部分，这一点，恐怕没有一个西点军校的人会怀疑了。

西点军校的所有场所都十分干净整洁，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在校园内，无论在教室、在餐厅、在走廊、在训练场，所有的人都使用礼貌用语：“是，长官！”

西点军校的课程主要有数学、化学、历史、信息学、军事学、战术学、外语等等。根据西点军校的教学大纲，一般教育占 50%，军事教育占 35%，体格训练占 15%。教官们把这个安排称作西点教学的“三大支柱”。

格雷斯少校是体格训练教官，此人身高近 2 米，威风凛凛，对学生严厉得近乎无情。训练时，学生们身穿迷彩服，脚踏大皮靴，背负 5 公斤重的背包，肩扛训练用橡胶步枪——这种步枪和实战用的 M—16 式步枪重量相等。当走到水边时，格雷斯会命令他们投入水中。“放心，谁也没有淹死。”格雷斯说，“新生刚入学时，有 35% 的人不会游泳，可是到毕业的时候，他们个个像鱼儿一样游来游去。”

我们在西点军校所看到的对抗性最激烈的活动是拳击。中校教官米勒说：“未来的军官们必须具有勇敢、献身、主动、坚韧和顽强的品质。在这方面，拳击能造就他们。”在拳击房内，我们看到两个学生在对打，有二十

多个学生在一旁呐喊相助：“约翰，上！约翰，加油！”那个名叫约翰的学生被对方打得鼻青脸肿，胸前的汗衫上全是血。最后裁判判他输了，他还很不服气。

在西点军校的校史上，记载着一些有趣的资料。第一个进入西点军校的黑人名叫亨利·弗利浦，毕业于1877年，到1980年西点军校才有第一位女毕业生。在海湾战争中，西点军校的学生只有一人丧命，确切地说，他是在宣布战争结束后才死在伊拉克沙漠里的，这真是对生命的嘲弄。西点军校学生不是不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一位教官说：“谁选择了军旅生涯，谁就不能怕死。”

军校也必须面对学生之间的爱情问题。西点军校是一个很重友情的地方，学生之间产生爱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军校有一条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必须过独身生活，在毕业前，不允许任何学生结婚。军校尤其禁止一年级学生同二年级学生、三年级学生或四年级学生建立恋爱关系。对于高年级学生，则不反对他们谈恋爱或订婚。

可以这样说，西点军校，是美国高级将领的摇篮。

日本高中生与寻呼机

在祭坛上，点缀着一只大米老鼠和一圈鲜花；在祭坛里边，挂着女高中生阵内和美面带微笑的遗像。去年7月，阵内和美因挨教师体罚而死去。她的家在福冈县饭冢市。

父亲元春先生取出了女儿和美曾经使用过的粉红色的卡片型寻呼机和笔记本电脑。他把和美的朋友们的赠言都记在这两样东西上了。这些赠言都是以数码表现的。笔记本电脑写着密密麻麻的数码，例如“11014(希望见面!)”，“33414(寂寞啦!)”等等，都需要把这些数码转换成语言。

“最初，我什么也不懂。在和美朋友们的指导下，我渐渐地能读懂了。当我知道了这些数码的意思的时候，心里非常难过。可是，只要寻呼机一响，我就感到和美还仍然活着！”

现在，不论发来什么样的数码，他都能看懂了。如果他知道对方是谁的话，也会发回一个数码：“0833(请休息!)。”

青年人喜欢寻呼机

去年年末，在公审这个体罚学生的教师的那一天，死者的父亲元春先生收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赠言：“(教师的日子)69294(难过了)”，“9091041—091031(请振作起来吧!)”，等等。

元春先生还收到过：“(和朋友)90941041(打架了)。”他立刻为这个人发去了：“794947314(请与朋友和好吧!)。”

他与这个朋友连续联系了两三天。几天之后，那个朋友发来：“79497210(我们已经和好了!)。”这样，元春先生便放下心来。

“在大人的眼里，寻呼机是微不足道的小玩具，可是它却联系着朋友们之间的心。寻呼机虽然没有嘴，不能直接说话，但是，仅以数码传达也已经足够了。只要寻呼机还响，我也仍然会继续把它使用下去。”元春先生说。

申请片假名显示寻呼机的人数越来越多

据日本电话电报公司统计，使用寻呼机的人中，约七成是商务人员以外的个人。其中10多岁至20多岁的女性占八成。现在，使用片假名表示的寻呼机已经成了主流。

除了单纯地交换信息以外，在年轻人当中还流行着这样的使用方法：利用电话拨叫近似于自己的寻呼机的号码。一叫通近似于自己的寻呼机的号码时，就会立刻得到对方的回话：“我是某某，你是？”这时再把自己的寻呼机号码告诉对方。如果对方回答的姓名是异性的姓名，那么就立刻回一个：“想和你见面啊！”

就这样，他们之间便在寻呼机上交换各自的一些情况。如果两个人觉得挺合得来，那么就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对方，并相约直接见一次面。学生们在联系召开联谊会的时候，也使用这种方法。

可以谈近一个小时

埼玉县的一个女高中生（17岁），与一个不相识的人进行过“寻呼机交谈”。有一次，她要传呼一个朋友，可是，她把传呼机号码打错了，而自己的寻呼机上出现了一个：“你是谁？”而且是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传呼机号码。她发现自己打错了号码，就回复：“打错了号码，对不起！”

她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对方，另外，还把年龄和校名告诉对方。对方是东京都内的一个大学生。他们利用寻呼机交谈了近一个小时，话题是关于各自学校的活动。“虽然寻呼机不能像电话那样直接交谈，但是，却远比电话安全，就像通信一样，有着许多乐趣。在我的朋友当中，也有许多人利用寻呼机和‘传呼朋友’交谈啊！”

一个在东京都内的私立学校上学的女高中生（17岁）说：“我的寻呼机经常接到移动电话的号码。因为这个号码是以‘030’开始的，所以我知道这是个成年人叔叔的电话号码，就不给他回话。如果是‘080’开头的电话号码，因为这是最近的新号码，利用这个号码的年轻人不少，所以虽然猜不到是谁，也常常打回一个电话。”如果呼叫的是商务人员的话，他们也许会无视那些不认识的号码与留言。但是随便地和那些不相识的人进行交流，也许就是今天的年轻人的个性。

现在，购买新的寻呼机的人和借用新的寻呼机的人在不断地增加，约有8000多名女高中生登记了寻呼机。对各种企业提出新产品开发意见的“企业发展规划公司”的中村泰子社长这样说：“用寻呼机呼叫女高中生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现在已经不用了’，当进一步确认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她们已经更换了寻呼机。”

那些女高中生们希望得到新型和新功能的寻呼机，可是，她们还有其他“目的”。今年春天，一个毕业于神奈川的高中女学生（18岁），从两年半前就开始使用寻呼机，已经换了三个。

“最初的那一个寻呼机，只能打进数字，而且故障特别多，因此，我换了一个。”从那时起，她就不再把号码告诉不愿与她联系的人。而且有许多人不再愿意交换那些毫无意义的话语了，有许多的年轻人经常收到一些令人讨厌的或者是可怕的话语。

要的是呼叫，不答也可以

日本电话电报公司售后服务部关根尚伍部长说：“在和未成年人签订的合同中，我们尽量做到：要有父母的彻底承诺，才可销售。当发生了与寻呼机有关的事件时，就容易处理了。我们提醒各个营业所都要注意这样的销售方式。关于使用方法，我们也需要提醒用户。”

蜂窝电话和移动电话增加得虽然特别快，但是，寻呼机的吸引力还仍然很大，这是因为，寻呼机有着它自身的特点：因为不知道对方是谁，所以即使是令人讨厌的人在寻呼，也必须立刻回答。关根说：“以接收者优先的寻呼机，需要量还是很大的。”

东京都的都内私立女子高中的一名女学生说：“寻呼机这东西，如果你没有，就不会知道当寻呼机传来呼叫时的快乐。虽然大人说高中生不需要寻呼机，可是，我有了寻呼机以后，给家里节省了很多电话费。”

一位研究年轻人文化的学者厉内良先生分析说：“现在，由于校内的学生之间的关系淡薄，所以也许就要去寻求校外的交流了吧！能起这种帮助作

用的就是寻呼机

白俄罗斯的大学生

白俄罗斯的大学生永远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他们思想活跃、健谈、善交际，希望了解外边的世界。他们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利用各种场合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可能是从小受苏联集体主义教育的原因，白俄罗斯的大学生喜欢将自己置身于集体之中。无论是上课，还是课余活动，他们总是男男女女一大帮凑在一起，就像一群天真的孩子，有说有笑。白俄罗斯的学校对纪律性要求不高，平时学生显得比较散漫，上课时学生可以随便提问，也可以随时离开教室。当地 10 年制学校的学生上课时也是这样，据说，这样可以使学生保持旺盛的精力。学生离开教师多半是到外面去抽烟。白俄罗斯大学生抽烟的很多，男生抽，女生也抽。当地的女孩子把抽烟当成一种时髦，一下课，卫生间里经常是烟雾弥漫，让人喘不过气来，学校对此也无能为力。

白俄罗斯的大学生在校期间可以结婚、生子。婚礼一般都很简单：新人们在结婚登记处登记后，到无名烈士纪念碑献上鲜花，婚礼就算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在宿舍里举行简单的婚宴。学校对结婚的学生很照顾，为他们提供宿舍，学校还享受法定婚假。女生生小孩，在休完法定的产假之后，可以回学校继续读书。

在白俄罗斯留学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白俄罗斯青年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勤奋学习的精神。苏联解体后，白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少，学生们连教科书都没有。在冰冷的教室里，连续两个小时不停地记笔记的滋味是中国大学生很难想象的，两个小时下来人都冻僵了。即使这样也很少有人缺课，因为他们知道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只有掌握了一技之长才能为自己寻得一席之地。每个大学生的月奖学金约合 10 美元，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大多数学生在苦读了一天之后，煮一锅土豆充饥。为了支付不断上涨的学费和生活费，许多学生不得不边上学边打工。新闻系一女生就利用业余时间在我们宿舍打扫卫生。每天大家还在熟睡，她已经开始工作了。就是这样起早贪黑地干，她每月才赚约合 15 美元的卢布，但她已经很满足了。有了这份工作，她既可以维持学业，又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是白俄罗斯大学生的脸上很少看到忧愁。他们永远是那么自信和快活，因为他们坚信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用心“看”世界的盲女

德国约有 5000 余名失明的青少年，他们通过感觉和触摸来认识周围的世界。同正常人一样，他们的生活同样充满了快乐和忧伤，奋进与追求……他们是征服黑暗的人。

15 岁的德国少女薇蕾娜出生在景色怡人的博登湖畔。自呱呱坠地的那天起，她秀丽的大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世界在她眼前漆黑一片，她只能通过听觉来捕捉，通过触觉来感知周围的一切。长这么大薇蕾娜还从没亲眼看见过树呀，鸟呀，更别说同常人一起分享由赤橙黄绿青蓝紫组成的五光十色的缤纷天地了。不幸的女孩至今还不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她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这一天了。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约有 4200 万人双目失明。仅在德国就有 16 万人之多，其中 5000 余名是同薇蕾娜一样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德国《街道交通许可条例》第二条规定，盲人必须手持拐杖，臂戴黄底黑点的袖章，使正常人对他们区别对待。但薇蕾娜从不戴袖章，她觉得这好像在身上盖了一个图，显得同周围格格不入，很不自在。所以有时在路上与人发生碰撞而遭到一两句责备的话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她没有戴标志，谁又会想到这个年轻姑娘其实什么也看不见。

薇蕾娜 4 岁进幼儿园。她是那儿唯一的盲童，不过并没有因此比别的伙伴多得到一丁点儿特殊照顾。直到 6 岁她才到黑森林地区的一所盲人学校上学，也就是从那时起她才开始习惯在盲人中生活。回忆童年，薇蕾娜不无幸福感：“我同视力健康的小伙伴们一同玩耍，还同我的马儿一道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直到现在，薇蕾娜还不时在周末清扫马厩，或骑着心爱的小马吉米在草地上奔跑。

两年半以前，薇蕾娜进了慕尼黑盲人学校，如今她已是九年级学生。在学校她学会了用盲文读写，把听到的东西在盲文打字机上打出来。同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她还能以速记速度打字。

薇蕾娜爱好体育运动。她最擅长的项目是田径、滑雪和射击。眼睛失明的薇蕾娜怎么能瞄准射击呢？“这都靠我的听觉。我站在靶前头戴耳机，枪上有一小束激光线同一个发声装置相连。如果我正好瞄准 10 环处时，发声装置就会启动。这么一来，我几乎百发百中。”薇蕾娜还到过科罗拉多、西伯利亚、瑞典、罗马等地参加比赛，获得过上百枚奖牌。现在她已是德国残疾人国家队队员，在她的年龄组中是全德最佳 30 名盲人运动员之一。薇蕾娜曾参加过亚特兰大奥运会。遗憾的是她不能亲眼目睹赛场上激烈的比赛场面，幸好当时随队教练坐在队员们身边，把赛况详细地描述给她听。

薇蕾娜心目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盲人不是用眼睛，而是凭心灵去观察世界。我们用听觉、触觉和想象力来替代视觉，在我的想象中世界五彩纷呈。我了解各种色彩，红、黄、绿对我来说是喜悦的颜色，赭色代表悲伤。”

位于德国蒂宾根州的马克斯——普兰克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所进行的研究发现，盲人虽然视力受阻却能在其他感觉器官上得以补偿，正常人通过视觉感应来激发脑神经细胞，盲人则通过听觉刺激来把握空间方向。他们其实是用耳朵在看。不过，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对当代的科学家是一个未解之谜。

薇蕾娜的感觉器官也同样不错。一段路她只要走过两遍后就能准确无误地记住哪儿有障碍物。在熟悉的环境中她单独行动毫无困难。她喜欢骑马，给马装笼头，上鞍垫，这些活她都能自己干。只有在无法靠自己把握方向的情况下，薇蕾娜才需要他人的帮助。比如说跑 800 米时，总得有一个护理员跟着薇蕾娜跑，朝她喊话，给她引路。

对薇蕾娜而言，失明是伴随她一生的不幸。对此她并不苦恼，而是定下了明确的目标并满怀信心地去努力实现。薇蕾娜的目标是到正常人的大学攻读心理学。她想成为一名心理学家。

如果薇蕾娜可以许三个愿的话，她最想得到些什么？“我的鼻子太大，我想有个小点儿的鼻子。我还想多交些眼睛正常的朋友，他们愿把我当正常人对待并完全接受真真实实的我。不过，我最热切的愿望还是能够从镜子里亲眼看一看自己的模样。”

精神的流浪

乔治平静地向我们宣布了他也是同性恋。他说很对不起，一直没有勇气告诉大家。虽然在美国个人的隐私权是极被看重的，乔治完全有理由不告诉我们他的生活方式，但他还是决定告诉我们。乔治是学校民主党的领袖、加州州长竞选人，布朗女士来校讲演时，乔治是第一个在会上发言的人。几万名学生面前，他出尽了风头。

后来我们一起去喝啤酒。有他、我、鼓手约翰、校刊总编布莱尔。乔治很少说话，非常安静，女人都愿和他做朋友。大家在讨论 1995 年来校讲演的客人名单，我报了张德培的名字，他们不知道。中国人里他们只知道毛泽东、邓小平。布莱尔很活跃。我们曾在报纸上论战过。他认为在文化多元化的美国，交朋友是平等的。我在文章中攻击他天真地忽视种族歧视是一种变形的说谎。那天，大家过得很愉快。我没有带身份证，不能买酒，他们让我喝他们的扎啤。

乔治爆出新闻不久，约翰又出了问题：他的女朋友试图自杀。她的神经突然出了问题，她每天大哭大叫，不能平静。

“我每天在医院守候她，我不去上课和工作，但她对我说，她恨我，不想见我。她的自杀是我造成的。我不懂。我离开她了，觉得自由又回到了我身边。”在一个咖啡馆，约翰对我说。我们的身后悬挂着一幅幅的抽象画。我知道他的女朋友爱琳是一个充满激情却没有才气的艺术系学生。我看到约翰的眼里充满了痛苦。

我给他讲我在中国大学军训时的经历，我说：“那时我什么也不想，只是把自己的步子走好，然后回去大口吃馒头、喝汤。”“也许我的女朋友需要的是这样的锻炼，而不是心理医生。”约翰说。

事隔不久，报上一篇头条新闻又使我大为震惊，美国青年人，我不懂。

那是一幅大照片：一双手上面托着一片叶子，题目是“它杀了她”。原来，我们中间的一个女孩子，也是约翰以前的女朋友，使用巫婆给的堕胎药后，死于大出血。堕胎在加州是合法的，但她为什么不去医院。大家不得而知。那个死在肚子里的孩子的父亲是谁，也是个谜。

一个个悲伤的消息，使大家都很沉闷。而我也在一次一次地看到西方工业社会下扭曲的青年人的心灵，我为自己身上流淌着那种东方悠远绵长的血液而自豪。

万圣节，大家在市中心的一家爵士乐俱乐部开 Party，我们在一个挂满雕塑的黑暗的小屋子里听冥想音乐。和我在一旁说话的是斯地夫，他是一个非洲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混血儿。他告诉我在他妈妈生他以前，他那加纳来的父亲，就把他们母子抛弃了。他说他长在印第安部落里，亲眼看到他们的同胞怎样为嗜酒所折磨。“美国人，为了扩大市场，把酒倾销给那些没有身体抵抗能力的印第安人，用酒来剥削他们。”

“他们现在又强迫中国进口他们的香烟。”我说。我们虽都在美国，但提起美国，还都是他们他们的。

斯地夫指着前面一群抽烟的人告诉我：“他们在吸大麻。”

那群人里有我的朋友。他们都是优秀的学生，很多人都拿奖学金的。象约翰，他的成绩全是 A。我们在一起，经常谈论很深刻的问题。我们探讨禅、瑜伽、种族、社会等问题。在我看来，他们都是美国人里杰出并充满思考的

那种青年，但我不懂他们为什么吸食大麻。我走过去问可不可以拍照，一个自称是共产党的人告诉我，“我知道你不会去告警察，我愿意你拍照。”他又为我重复了一下他的吸烟动作。在那时，我按了快门。

吸完大麻，他们开始快活地打起鼓来。约翰是这里最好的鼓手。他打得十分忘情。他告诉我，他有一种释放感。我说：“只有意志不坚定的人，才需要毒品来释放自己。”

“那你就没想过试试吗？”

“想过，但我的自我知道怎样平衡我的超我和本我。”约翰是心理学系的学生。我跟他谈心理学术语。

他说：“安妮，也许只有中国才能治好我的病，带我去中国吧。”

我交的这些朋友，都是美国的左派，也被称为激进分子。他们热爱东方文化，不像一般美国的肤浅的青少年对中国一无所知，且没有任何兴趣。他们研究东方历史、哲学、医学，很多人都喜欢易经。但我同样又看到他们脆弱的一面，一种精神上的无所归依——在冰冷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精神的流浪和孤寂。

美国社会充满了机会与选择，但这种太多的选择又常常会带来意识的混乱。心理学家们认为，人是在追求一种越来越高级的精神境界。而痛苦，是一种高级的意识。也许，我只能这样来解释我的朋友们的精神危机。

我承认，书、知识也带给了我们很多智慧的痛苦和没有答案的问题，但我仍然快乐。我有爱我的父母、家人和朋友，我有 5000 年博大精深的文化的支持，我有自己明确的奋斗目标。我的内心是平和的，况且，我还年轻，刚过 20 岁，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激动的事物等着我呢。

英国大学生：世界高科技作弊冠军

据英国报纸最近批露，不少英国大学生运用高科技作弊，而且很难被识破，因此，他们中已有人自称“世界上最狡猾的作弊学生。”

他们中有的人把微型无线电送话机置于钢笔套内，有的人设法带进事先录好的有关内容的音带，及事先编好的程序的微型电脑、数据资料，然后再用微型设备收看，写在考卷上。

由于英国各大学考试中都发现过这种情况，因此，1995年5月全国考试就使有关方面更加紧张。一些考官发出警告：已发现了一种作弊新工具，那是卡西欧美国电子公司的产品。

一些报纸也透露，这种每台售价为80英镑的新玩意儿，是专为8至12年级学生设计的，英国已有4万多名学生购买了它。据卡西欧公司估计，1995年，它还将在英国销出10万台。

最近，英国心理学协会主席、普利牙斯大学心理系主任史蒂文教授搞了一个调查，2000名被调查的大学生中，50%以上承认自己作过弊，2%承认曾贿赂过考官。近两年来，他们共运用过20多种作弊方法，其中不少是属于高科技的。在作弊学生中，54%承认曾抄别人部分答案，6%偷过别人的卷子，大部分采用过传统作弊法，如夹带答案纸条，把答案写在手脚上，用“人体密码”互传答案（竖指头或摇头点头等），但高科技作弊率显然大大增加了。

伊母波里亚大学的戴维斯教授指出，作弊行为各国大学都有。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的大学也很严重，但是，讲到高科技作弊，英国无疑是世界冠军。

因此，不少公司投学生所好，陆续推出了不少新花样。比如，伦敦一家商店，就专门供应钢笔加无线电耳机，只要花上2000英镑，就可以从考场内将考题传给考场外，然后由场外传进答案，他们还常常向别人夸口说自己干得多么好！

当代日本大学生的“考试地狱”

东京大学生在日本的声望，相当于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加在一起。日本人把能上东京大学作为人生最荣耀的事情而多处吹嘘。战后日本的历届首相一半出自东大，日本高级官员中的五分之四和大批的大公司经理董事也都来自东大。每位日本家长都意识到，如果希望孩子将来能有所作为，那么就必须竭尽全力保证孩子进入东大，或者至少进入像京都大学那样的一流大学。但是日本国立大学的现状又给众多的日本年轻人打了一针清醒剂。全日本国立大学一共不足百所，只能接受中榜考生中的 20%，其余的 80% 中榜学生们只能上收费昂贵的私立大学。显然，这些青年们的前途相对而言就要大打折扣了。虽然早稻田大学这样的私立大学在日本也享有很好的声誉，但毕竟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日本人听到私立大学两个字都会皱眉头，就像中国学生报了清华、北大，却接到的是普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样。

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这些名牌大学，唯一能被校方看好的是申请人的入学考试成绩，开后门进入这类大学纯属天方夜谭，首相的儿子考不好也只能上私立大学。相反，偏僻的北海道渔民的儿子，只要成绩优秀，照样会金榜题名，很顺利地跻身于日本的特权阶层。日本一位极负盛名的大公司负责人说：“我的生活确实是前程锦绣，我认为这是与我努力奋斗分不开的，但我更相信我青年时参加东京大学的那场入学考试，那次赌博造就了我。”

日本国立大学的考试一般分两个阶段，每年举行大学考试的二三天被日本人公认为“考试地狱”。根据东京地方政府的调查显示，高中的高年级学生是日本焦虑程度最高的人口组，考试前几个月，考生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 5 小时。考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淘汰明显不合格的学生，时间一天，这是全日本举行的统考。第二阶段主要是各大学自己组织的考试，时间 3 天左右，考 8 种课目，题型以填空题、问答题为主，主要考考生理解知识的广泛性及其熟知程度。

说到底，日本大学入学考试成功仍在于死记硬背，因此，日本的高中生们把时间花在死记硬背上就不足为怪了。考试卷从公路里程到英国与拉丁语法异同什么都考，包罗万象，以至于乘地铁上学的学生们，一手扶着拉手，一手还拿着词典，嘴里在念念有词。欧美人常担心这些日本孩子脑筋是否正常，但他们随即就会被告知：这算不了什么，要上大学都得这样，必须经过这番“考试地狱”的锻炼。

在日本青年学生当中，也有一些人难以忍受考试竞争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而纷纷走向另一个极端：神经崩溃导致自杀或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呈直线上升趋势，成为日本触犯刑律最多的人群。这种“考试地狱”对学生的摧残，在日本已引起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的关注，并引发了全日本关于教育制度改革的讨论，但最终不了了之，关键是有些上层人士认为这种教育制度无可挑剔，恰到好处。

美国青年乃至中国青年考上大学以后，往往面对更多的课程而须加倍地努力，否则有可能被淘汰，面临留级或离校的压力。但对日本青年来说，上大学就等于身心的彻底大解放，一旦通过可怕的地狱式的升学考试，日本大学生往往就松懈下来，以至于在酒馆里的学生比在图书馆里的学生多得多。对于大学生们来说，考上大学就成为天之骄子，这点比中国更甚。不管怎样，

凭成功地冲出“考试地狱”这一点，那个日本大学生就已经表明了他是个“人物”，而在日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90年代香港青年的新走向

对祖国多了一份承担感和责任感

长久以来，香港的年轻一代颇缺乏政治意识，对国家大事、社会转变，均置若罔闻。他们的生活中只有两个追求：在学校时，求取好成绩；就业后，希望能赚更多的金钱去追求自己的生活享受。然而，自从进入过渡期以来，97香港回归祖国概念的提出及其带来的社会发展变化，却着实让青年人的政治意识、国家观念觉醒了过来。

今日香港青年人对祖国民族的感情增强了，且渐由感性趋向理性，这体现在他们诸多对祖国表示热爱的行动上。除热心捐助祖国的希望工程等活动外，他们还自愿组织起来到祖国内地参观访问，深入到工厂、农村去体验内地普通百姓的工作和生活。尤其是在贫困山区与农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切身感受，使他们内心深处多了一份民族的情感，他们的价值观中多了一份对国家富强的承担感和责任感。

能显示出能力和价值就是成功

在商业性极强的香港社会中，对一个人是否“成功”的界定，向来主要是以学历和“身家”（即个人财富）的特定标准去衡量。但当代的香港青年人对这种苛刻死板的衡量标准却十分反感，他们要的是对一个人存在的多元价值和长处的肯定。在今日香港青年人眼中，人有千百种长处，专业技术、口才、艺术修养等等，都能显示出一个人的能力和价值，何必非要把青年人推进“学历”及“身家”的局限里，去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或谁高谁低呢？

值得庆幸的是，进入90年代以后，香港的社会、学校和家庭已经开始从多方面去评判青年人的才能和价值，这为当代青年人减轻了许多心头上的压抑，令今日香港青年人多了不少朝气和生机。

努力工作，不忘玩乐

当代的香港青年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工作，十分讲究职业道德。他们工作时既努力投入又不会因工作而废寝忘食，因为他们亦非常重视健康和“玩乐”。他们对工作的趋向，不再完全是以“金钱挂帅”，而开始对重视能否开阔自己的眼界，能否令自己有工作上的满足感，以及这份工作的意义及价值等等方面。

“只身闯天涯”是今日香港青年人所向往的，而以往那种以大家族为背景的生意已不再值得他们羡慕。当然若家族性的生意事业能接受新的观念或形式，他们也会同意。今日香港青年人，随时会四海漂流，或工作一段时间又四处漫游，享受人生。这一点与前一辈人的努力苦干、默默耕耘的工作态度迥然不同，也许这就是当代香港青年人工作中的一种亚文化吧。

在广州读书的港澳大学生

在暨南大学校园内，有1/3的学生来自香港、澳门等地。我们同在一个

食堂吃饭，同在一个教室上课，有时还会为一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要说对港、澳学生的了解，我们最有发言权了。

青年标本

宋家明中等身材，貌不出众，衣着整洁简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那头永远打着腊，纹丝不乱的头发。在我们看来，这是花花公子的行径。而在他看来，这是礼貌。

宋家明修读国际新闻专业。他上课永远不迟到，而且总坐在第一排，笔记做得一丝不苟，听讲时专心致志；做操时更为认真，该蹦该跳从不打折扣。他谦虚有礼，乐于助人，没多久，就被大家推上了班长的宝座。他勤勤恳恳地担起了责任。当班长时，并非凡事顺利，有时还要遭到大家的误解，宋家明为这些班务忙得焦头烂额，不知他心里是否后悔之极，但他的神情却依然愉快有礼。

总之，宋家明是个让同学们感到自豪的大好青年，他有罕见的勇气去追求真善美。

学习机器

楚翘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

虽然来自花花世界澳门，但她一点也不古怪精灵。嘴唇不涂成金色，头发不染成银色，一年四季穿着印有米奇老鼠图像的运动衣，留个清汤挂面头，头发永远如丝般干净。

楚翘对大陆的一切并不陌生。她原籍珠海，1980年6岁的时候全家移民到了澳门，属于澳门的新移民，也就是改革开放后才到澳门的移民。澳门紧邻珠海，珠海的巨变她清楚得很。从小写作文，她就会套这个公式：“自从改革开放后，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哈哈，和我们写作文不谋而合。

很快，楚翘就和广州几个活泼时髦的女孩子混得滚瓜烂熟。这几个女孩子成了她的翻译机——她听不懂普通话，那些带内地口音的普通话更使她八丈金刚摸不着脑。她上课不是听课，而是“看课”——看同学的笔记。她不像那些侨生临考试了，才借来笔记整整齐齐地去复印，一切合格万岁。她是个非常刻苦的学生，其刻苦程度简直让我们大陆学生想不通。当我们7点多钟匆匆爬起来梳洗的时候，她早已端坐桌前，开始晨读。中午，当我们睡大觉的时候，她也在埋头读书。中午读书这个习惯是她从澳门带过来的，港澳的学生中午都不习惯休息。晚上，楚翘更是图书馆的固定人员。

开始，大家以为她总有松懈的一天的，谁知道，她每天如此，每学期如此，每年如此。楚翘之所以这样刻苦，原因很简单：她来这里不是度假旅游，她要靠现在学的本事挣钱。她家并不富裕，开家小饭馆而已。她有机会上大学，已是谢天谢地，况且这里的功课很深，她读的又是繁难的医科，她要加倍努力才可以跟得上。即使学成归去，她还须重新考牌才能就业，于是她得像输入电脑程序般不停学习，一刻也不松懈。

“选修”爱情和流浪

阿飞刚来大陆的时候，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挺拔的身躯。他给人的印象就是像一棵长势茁壮的树，时时刻刻迎接着清新的阳光雨露。

阿飞读的是中文，他完全是为了兴趣而读书的。短暂的闲谈中，大家发现这小子颇有几滴墨水，这在港澳生中尤其显得难能可贵。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他充满求知欲，对我们这个世界几乎怀着一种浪漫幼稚的想法。阿飞也许以为，中国就是苍茫暮色中的一个和气纯朴的老头。为了求证这个观点，他兴致勃勃地参加学校活动，热心地和内地学生交朋友，还动不动就旷课去游历国内的名山大川。

阿飞喜欢读书而不喜欢上课。他大肆旷课，事后又彬彬有礼地向老师补假。

像阿飞这样，他的罗曼史当然不会遮遮掩掩。据不完全统计，在大一的一学期，和他有牵连的女孩子有以下3位：一位学业出众但身材平板的侨生女孩；一位敢作敢为声色俱佳的内地女孩A；一位精神有些毛病的内地女孩B。阿飞和内地女孩A的故事挺像样，据说，他每天送一束花给女孩A。但阿飞和女孩B的故事却搞笑得很。据说，阿飞在上课时看见女孩B独自下五子棋，便和她对棋，从此被缠住。女孩B还宣称阿飞欠她的钱不还。那么追求真爱的阿飞不知是何感想？

这一切都发生在大一的一学期。大一的下学期，他便不知去向了。据说，他跑到北京电影学院去求学了。

当我们上大二的时候，他又出现在我们学校。他换了专业，留了一级，那股不断追求的锐气消退了。他旷课旷得更加厉害，老师都弄不清楚他是否在读。他再也不参加学校的任何活动。

偶尔见了，跛着拖鞋，直着眼睛向前走，别人和他打招呼，他也不应。不知他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他的脸色苍白、面部浮肿，眼睛不再明亮，只剩下血丝和厌烦。

大二没读完，他便彻底消失了。

大家都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只知道，这个孩子曾那么热切地追求一些大家都不曾费心去追求的东西，结果，他失望了。

专攻吃喝玩乐

在女孩子眼里，来自香港的玫瑰当然不算个美女，但在男孩子眼里，天知道她是不是美女。

黄玫瑰的身材模样已完全成熟。她穿着紧身牛仔裤，大腿上裂了一道口子，露出丰硕的肌肤。她头发剃得极短，类似男孩子的“板寸”，还染成了金色。

她肤色苍白，眼睛的颜色也比较淡，似乎是个混血儿。她的神情通常都是冷酷的，虽然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例如见到校长，她神情可以迅速变得热情和善。

这个女人今年居然才17岁。

黄玫瑰有数不清的男朋友。她的原则是：男人如衣服，朋友如手足。她认为这很方便。甲男帮她拿早餐；乙男帮她提书包，统筹管理，生活舒适。她说男女在一起如果不开心的话，尽可以分手，但不要伤了和气，朋友还是

要做的。说毕她仰头哈哈大笑。如果分了手便成陌路，那她还剩什么朋友？

让金童玉女们义愤填膺想不通的是：怎么会有男孩愿当她的男朋友？

黄玫瑰颇有女强人本色。她说：“等自己的男人发达，还不如靠自己发达。我又不是没本事，考不上大学，干嘛要做黄脸婆看老公脸色。”所以，她和男人的地位很平等。男人花心，她更花心。男人干粗重活，她也干粗重活，从不肯让男人看在她是女人的份上帮她。

“及时行乐”是她的绝对准则，这家伙刚上大学的时候便玩得无法无天，无日无夜。什么节她都过，什么聚会她都参加。白天睡大觉，晚上出去“泡”。早上 10 点钟她刚起床在校内的茶楼吃早点，深夜 12 点她和时髦青年结伴吃夜宵、泡酒吧、上 Disco，反正她有时间有金钱有胆量，玩得起。大陆的消费比香港低，每月 1000 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在校内已可以过得像个富豪。

一学期下来，她旷了 60 多节课，被学校严重警告，要开除她。不知她是否痛哭流涕，反正给挽过来了。从此，她开始精研《学生手册》，潜心揣摩如何在最大限度内违反校规而不被罚。

17 岁的黄玫瑰继续把所有的时间精力花在玩耍享乐上，不知明年看到她的时候，她会不会剃个光头。

不过，像黄玫瑰那样虚度光阴的港生不多。沉迷于玩乐的港生，大三大四，有自觉起来的，但愿黄玫瑰能尽快觉醒。

对比年轻的脸孔

我时常留意身边同样年轻生动的脸孔，希望能发现港澳生和大陆学生的些许差异。

表面看去，港澳生的衣着比大陆生时髦，毕竟他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比大陆生高些。比如，他们可以合住一间房子，年租 2400 元，里头可以像模像样地摆放彩电，冰箱、洗衣机等高级家电，而大陆却七八号人挤在同一间房内，年租只需要 200 元。假期，他们潇洒地旅游去了，而大陆生更多地去兼职挣钱了。

在成绩表上，一般排在前面的都是大陆生，因为大陆生是真刀真枪考入大学的，基础比较扎实，而港澳生则只要通过有关方面专门给他们制定的考题，就能进入大学，那考题自然无法与大陆的高考比。然而，当港澳生和大陆生齐齐坐在课堂参加期末考试时，考卷却是一样的，那么差距就出来了。难怪有人说，大陆生进大学难，出大学易；港澳及侨生进大学易，出大学难。再说，一些优秀的港澳生在中学毕业后，有钱的去西方留学，有本事的挤上了港澳高等学府这条独木桥，剩下的就不言而喻了。

在个性方面港澳生更加自立。新学年伊始，港澳生办理签证、买机票、收拾行李等通常都是自己一手操办，到学校报到也井然有序。而大陆的新生，通常是双亲送至校内，还要为他（她）叠床铺被，打点完毕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去，而这位宝贝女儿（儿子）却愣在一旁任父母忙碌着。这情形只要你在开学时光临一下学校，光是看看拥挤在校园内的车龙就清楚了。

港澳生生活态度比较自由、放松，特点是好玩。旅游、传统节日、洋节，一年到头玩得不停不歇。有些大陆生避而远之的集体活动，像烹饪大赛、插花大赛等，他们也参加得不亦乐乎。譬如，某传媒递过话筒要现场采访，大陆生怎么说也有点拘谨，而港澳生却镇定自若，实话实说，轻松自如回答问

题。

港澳生普遍对政治不感兴趣，但这并不能说他们毫无祖国观念。大陆生从他们出生那天起就认可了祖国，并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而港澳生却在渐渐认识祖国。实际上，祖国日益强大，他们确实感到脸上有光。有位港澳生说：“平时我只顾开心，但谁要说中国的坏话，我就觉得刺耳，要反驳。”

当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区”后，相信两地这些年轻的脸孔会更加接近，更加上进，难分彼此。

造球场的小学生

那天我去五金行买东西，见一个金发黑孩子在服务台前不住向店员发问。一个小学生，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关于建材的资料？我很好奇，便前去和他搭讪。这个叫大卫的孩子告诉我，是老师叫他们建一座高尔夫球球场，他正收集资料。

小学生和建高尔夫球场？我更觉得出奇了，索性等大卫办了事和他在停车场聊了起来。大卫说，“高尔夫球场”是本周思想训练课的主题，思想训练课每天1小时，周一、周二讨论高尔夫球场应有的基本设备和理想的天然条件；周三、周四则分组开始设计九洞、树林、沙坑和小湖等。学校图书馆里有关高尔夫球的书籍都被抱到他们的教室里了。有问题可以问老师，也可以看书。周五，他们的设计大功告成，老师教他们把原始设计缩小成5尺见方左右的模型。周六或周日他们去商店打听材料的价格。下周上课得向教师交出一份报价单。

我觉得十分有趣，便要了大卫家的电话号码，每天等他放了学就给他打电话。

第二周，老师叫他们将整个建场计划写成一封信，写给谁都无所谓，但必须符合书信的格式。在老师修改同学们的信之后，同学们还得将信用电脑打印出来。第三周材料都买齐了，便开始动手做模型。周一在电话里可以听出大卫很兴奋，巴不得立刻完工。到了周五，大卫直后悔当初准备不足，在做模型时不知如何下手，只好临时查书，晚上又拖着父母上街买材料。我相信大卫的老师在检查他们的设计时就已知道这些问题，但却故意留给学生去发现。

以上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美国教育的一个特点——注重实用。大卫和他的同学们从书本知识融汇出自己的设计后，又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设计，最后还要将设计付诸实施。姑且不谈大卫由此对高尔夫球场了解多少，仅是3个星期经历的询价、比价、采购、分工合作等，对他都是受益非浅的，最可贵的是体验了知与行的微妙关系。

在美国，这样的思想训练课程托儿所就有了，在小学和初中是必修课。大卫只是五年级学生，他与五金行店员讨论材料价格时的神情，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么彬彬有礼，有条不紊。我想，国内的教育工作者读了这个故事，一定会有所启发。

明星的中学时代

中学时代明星像大多数人一样显得笨头笨脑，并没有明星的自信，让人羡慕。

有这样一位篮坛明星，连他的母亲都会告诉你，他在美国达拉斯南部一所中学求学时，胆小如鼠，极害羞，经常受到同龄人的奚落，绰号为“可怜虫”。15岁时，身高刚够5英尺，体重仅90磅。害羞、自卑以及严重的湿疹使他的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他的母亲说：“他太敏感，没有一个朋友，到18岁时还没有一次约会。”同学在放学后，或参加校队体育活动，或搞社交活动，“可怜虫”往往放学回家，一头钻进自己的卧室独自玩电子游戏。他的同班同学、现已35岁的达拉斯保安人员凯恩回忆说：“他心平气和，不引人注目。”

中学毕业后，他的身高才达到6.8英尺，同时表现出对篮球的特别才能。如今“可怜虫”已是芝加哥公牛队的一员——丹尼斯·罗德曼。

类似的例子很多。翻翻名人鉴，照片中的文字都在解释，少年害羞似乎是今后成名的必要条件。卡根是洛杉矶一位心理学家，手头上有不少好莱坞明星的材料，他认为：“中学阶段显得稳重大方的孩子在17岁左右已发育结束，以后就停止生长了；而那些原先笨拙的孩子后来却能名扬世界，这是因为他们需要时间学点东西。当他们有了自信后，便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

名人在校多数并不感到愉快。在影片《城市里的卡洛里德》中饰演角色的利·汤姆森在圣保罗一所中学上学时，仅在芭蕾课上显眼。平时同学常常对她施恶作剧，有一次还从衣箱中偷走她的芭蕾舞鞋，扔进厕所。她自己也承认：“我是被遗弃的人。”同样，米拉·索维诺虽惹人喜爱，1985年进入哈佛大学，可她在新泽西州一所中学就读时也有一大难题——身高。这位身高5.9英尺的女明星说：“我自感像一头长颈鹿，高出别人一大截，多么想与众人一样。”至于在影片《守湾人》中饰演角色的帕米拉·李，这位棕发“假小子”在中学时却显得太一般化。老同学回忆说：“那时，她太普通，总是穿运动裤。”确实，向来谦卑的李有一次吓得直往后缩，原因很简单，一个朋友帮她涂了一点眼影和唇膏。帕米拉说：“这太显眼，我马上就擦掉，那时，我从不化妆。”

不过，中学并非对所有未来明星都如此可怕。很多人在中学阶段就被发现有表演才能，超重的未来诗人詹妮弗·阿尼斯通也是在那时显露了其喜剧细胞，卡文·希军达斯升华了其敲击演唱的风格。卡文的一位老师回忆说：“有一次，我要求学生写一篇历史报告，任何形式都可以，卡文交上了一篇押韵的文章。”还有乔治·达罗耐，这位红极一时的篮球、棒球两栖体育明星在中学阶段就能看到未来，他对老师说：“先生，保存好我的作业，或许有一天我会成名，那时你就有了我的亲笔签名。”

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俄罗斯青年

70年代后期的俄罗斯尚是封闭社会。那时偶有机会在各地参观旅游，青少年给人的主要印象是观念正统，不苟言笑，纪律严明，举止刻板。与青少年交谈，你往往会听到“发扬革命传统”、“在苏共领导下”之类的成人语言。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的大变革使舆论和宣传的禁锢失灵，我们有无数机会与可能去直接或间接接触、了解各阶层的青少年，才算对他们那由信念、追求、思索、情愫等诸多因素和成分构成的、不断变化的内心世界万花筒，有一个虽嫌粗浅但却更接近真实的了解。

即使在60~70年代这样的俄罗斯社会发展“停滞”时期，青少年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幸运的。他们的家庭生活虽难称富裕，但也并不贫困。他们无一例外地有接受9年制义务教育的机会。多数人可以进入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深造。社会的封闭和官方的宣传使多数孩子相信前苏联社会主义的美好，相信当局内外政策的正确，纵使有人对宣传半信半疑，也找不出怀疑的根据。然而，当社会变革大潮冲破铁幕之后，孩子们的思想深处受到了一连串深深的震动。

震动之一。80年代以前，官方宣传中的西方是失业、犯罪、通货膨胀、无一是处的世界。而一旦打开舆论的大门，欧美日等西方国家之发达、商品之丰富、物质生活水平之高使青少年大为惊讶，甚至有些不知所措。1988年12月，莫斯科电台播出记者在一所中学对8年级某班全体同学的采访实况。一个男孩子对着电视摄像机说：“我们学习教科书，再看现实生活，觉得书里很多都是扯谎。比如，说帝国主义是处在最后阶段，是腐朽的，到底是不是腐朽？我看不是。连尼基塔·赫鲁晓夫当年都说过，帝国主义看起来腐朽，可闻起来又香又甜。”男孩子话音未落，全班30多名学生一阵哄堂大笑。多年片面宣传造成的印象在一朝一夕间化为乌有，出现了大面积的对西方社会的极度迷信和崇拜。一时间，西方的电器、汽车、服装、住房、电影无一不好，青少年的思想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震动之二。前苏联当权者70年代津津乐道“发达的社会主义”，青少年确也曾为“社会主义苏联的巨大成就”而骄傲自豪，80年代后期舆论放开后，大量揭露社会真实面的报道使青少年心目中多年的偶像和理想顷刻间倒塌崩溃。1989年年初，我们在当时苏联最高团校与来自各地的20多名团报编辑和记者们就社会主义这个大题目进行交谈。这些“宣传”骨干们非常坦率：苏联搞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不是真的社会主义，没人能搞清楚。但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没能给人民带来富足、幸福、自由与宽松，也是事实。这样的社会主义还不如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再也不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欢迎，因此迟早总要垮掉。当我们说，青年人看到弊端，应立志对现在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和完善时，多数的团报编辑和记者们干脆回答，改革解决不了问题，社会应当按瑞典、德国或西班牙模式重建。

震动之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在俄罗斯有着长期传统，卫国战争时期苏军解放东欧和70年代支持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所谓革命都曾教育青少年的极好教材。然而，当苏联终于不得不从阿富汗撤军，青少年如同全社会一样，良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部纪录片记下了一些从阿富汗回国的军人与青少年间这样的谈话：“派我们到阿富汗打仗，在这个时代是正常的吗？我的心里有这样的感觉，我干了一件与人的本性不相容的肮脏事情。”“过

去说去阿富汗是保卫祖国的利益，现在才明白，这是为了老头子们做出的错误决定付出代价。说到底，阿富汗与越南有什么差别？”有人说，阿富汗战争把青少年心目中的“苏联是世界革命堡垒”的形象“彻底摧垮了”。这话确实不无几分道理。

震动之四。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故乡、共产主义的理想等等，宣传中的一切都是纯洁伟大、公正、无私的。神圣庄严的说法曾贯穿在课堂课外一切活动中，在青少年心中打下烙印。然而，80年代后半期的新闻公开把苏联社会中种种黑暗现象和不少高级官员贪欲横流、腐化透顶的事实一古脑儿抛了出来，这使青少年和其他所有人都为之愕然。

高尚与卑鄙、伟大与渺小、正直与虚伪、空的宣传和铁的事实，在一系列尖锐的对立与矛盾中，造成一连串的震动，使许多青少年感到迷茫、失望、不知所措，更多的是消沉、冷漠、不关心和无所谓，很难谈得上有什么政治热情。例如，1991年曾是前苏联政治舞台上各派实力殊死搏斗的年头。各派在街头政治中都千方百计把本派和支持本派的力量拉到街头。然而，人们发现，无论在左派或右派的队伍中，青年人所占比例都不大。莫斯科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们参加街头政治活动者为数寥寥。我们曾经接触交谈过的青年大学生们表示，首先，政治是政治家们的热情，与青年学生关系不大；其次，政治本身是肮脏和黑暗的，青年人搞不清楚，如果有可能还是离得远些为好；再者，过去几十年，老一辈的生活中充满了政治，然而，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强盛，老一辈受到的常常是不公正的对待，这使老年人，更使青年一代感到严重失望。青少年学生中的多数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流派表示了相当明确的兴趣甚至信任。相当一部分青少年最为推崇的首推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认为瑞典、西德、西班牙和法国等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运动和思想都对西欧国家战后的发展和壮大产生了重要乃至决定性意义，俄罗斯如果实行社会民主主义，也会取得成功。

青少年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东方国家的文明与哲学很感兴趣，认为俄罗斯更多应是一个亚洲国家，应当信奉东方文明和哲学，而俄罗斯的苦难与危机也只能在东方的哲学与文明道路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青少年思想中的所谓东方，既包括印度，也包括中国和日本的传统与文明。

在民主与公开性宣传影响下，相当多数的青少年对西方的人权运动及其主张表示支持，并希望看到人权运动能在俄罗斯发展起来。这种思潮的出现与前苏联时期的已故萨哈罗夫院士推崇人权产生的影响有关，也与在苏联社会多年禁锢封闭之后，青少年渴望在俄罗斯新的社会形态下个人能够得到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发展有关。俄罗斯社会长时间处于经济和政治的动荡不安状态下，使青少年生长环境的综合条件明显恶化，大不如前。比如，社会各方面困难重重，无暇顾及青少年的正常和健康成长。国家财政虚空，通货膨胀严重，使教育系统资金来源得不到保证，正常的教学活动受到影响，青少年课外教育与活动设施的建设和运转也受到影响。又如，社会处在全面危机状态，各种不良风气沉渣泛起，横行肆虐，青少年纯洁天真的心灵首当其冲，受到不良影响。1992年年底，笔者在莫斯科市中心阿尔特地铁站的出口处亲眼看到，长数百米，宽不到10米的人行便道上，十几个用纸牌赌博的团伙一字排开，赌徒清一色是20来岁的年轻人。每一张赌桌旁都围着十几个青年。不出10分钟时间，一个男青年就输掉了2000卢布、手表和身上穿的皮夹克。警察当局忙于各种恶性犯罪，无暇它顾，而青少年教育部门则独力难

挡，只好眼睁睁地任其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听任影院商业化，片面追求商业利益，而完全放弃电影院的职能。结果，各地电影院纷纷进口并上映西方有刺激性内容的暴力和色情片，不少青少年对这类影片趋之若鹜，而影院对此只睁只眼闭只眼。城乡到处开放的电视录相放映点的录相片更不堪入目。处在这样一种环境和氛围中，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得到有效保障，这个问题已提到全社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8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社会的大变革给青少年的业余生活带来了一个新的现象，即青少年自发团体数量骤然猛增。青年人组织起来从事共同感兴趣的各类活动，历史、文学、音乐、政治等各个领域都有人涉猎。

青少年自发团体最早出现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一些大中中学生组织起诸如“野营歌曲俱乐部”之类的团体，从事歌曲创作或演唱。60年代末，“嬉皮士”或“摇滚乐”传入苏联，名叫“嬉皮士”或“摇滚乐”的自发团体随之大批出现。参加这些团体的青少年外表上模仿西方的伙伴，蓄须、留长发、不修边幅，平时聚在一起听摇滚乐或无目的地到处游逛，旁若无人。70年代，爱好体育的青少年建立起一批号称“球迷”的自发团体。在体育比赛时，他们在运动场上各自专为某一俱乐部运动队呐喊助威，平时则统一挂着该运动队的徽章，成群结队出现在公共场所。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参加自发团体的青少年人数急剧增多。一些大中城市参加自发团体活动的青少年占青少年总比率已达50%。全国自发团体总数有几十万个，出现了许多以关心环境保护文物保护为宗旨的团体，以及学习中国武术、印度瑜珈、日本空手道的团体等。另外，还有一些与社会变革内容相关的自发团体。许多青少年关心民主问题、历史问题、民族问题，组织起“民主与人道”、“历史与社会”等团体。还有许多青年学生组成的团体专门讨论研究和比较各国的不同生活方式等等。但与此同时，有相当一部分自发团体的活动内容引起社会公众的严重忧虑。如一些青少年聚众吸毒、酗酒，扰乱公共秩序；有的团体之间打架斗殴，争雄称霸；有的团体宣扬和鼓吹民族沙文主义思想。

90年代的头二三年到过俄罗斯的同胞，往往会异口同声地说，供应很差，生活艰难，但购物排队无人夹塞，公共汽车上相互礼让，环境卫生人人保持。俄罗斯人的文化素养与几十年来形成的社会风气，尤其与全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多种多样的受教育机会使俄罗斯青少年平均具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也使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他们对工作和生活的观念与老一代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说老一辈当年最流行的观念是集体、纪律、组织的需要，那么青少年一代则更注重个性自由、更强调个体潜能的发挥，更讲求实惠。“什么是理想的职业？”绝大多数青少年的回答是：“应当适合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具有丰富的内容。”“你最羡慕的职业是什么？”男青年认为，最佳的数种职业中，首推医生，以下依次为：工程师、作家、海员、物理学家、演员、记者、化学家。女青年认为，最佳职业是医生，以下依次为：作家、演员、教师、物理学家、工程师、化学家、记者。

社会的开放使西方物质产品直接进入了俄罗斯。西方国家如意大利、德国生产的名牌牛仔装、旅游鞋、运动衫等是青少年们紧追不舍的目标。由于真品价格昂贵，问津者不多，于是假冒产品大受欢迎。通过边贸从中国进口的这类冒牌商品如阿迪达斯运动服价格便宜，是俄罗斯青少年的抢手货。

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已经就业还是仍在校学习的俄罗斯青少年都很推崇

流行音乐。青少年最推崇的歌星中有一批是俄罗斯本国的名手，还有一批是美国、瑞典、英国、德国的明星。在青少年所喜爱的现代音乐形式中，摇滚乐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我们曾在莫斯科列宁山下的体育馆里当过一回观众，欣赏来自英国利物浦市的一个摇滚乐团演出。台上沉重的打击乐伴奏下，一位男声演员用英语演唱一首愁绪哀怨多于欢乐热情的爱情歌曲。四周看台上，几万名青少年听众击节和声，甚至站起身来随着强烈的音乐节奏呐喊跺脚，左右扭动，震耳欲聋的音乐和呼喊汇成的声浪刚落又起，整个体育馆内的气氛如痴如狂。

当 1992 年冬天漫步莫斯科街头，逗留在主要街道旁那一个接一个小商亭时，我们注意到，几乎每个商亭里面的老板都是青年男女。与其中几人交谈起来，他们虽然也屡屡抱怨这种新身份带来的烦恼，如劳累、紧张、黑社会帮派的袭扰，但说来说去还是觉得现在比过去在研究所、工厂或商业企业里要自由、满足和神气得多，而且绝不愿意再退回到过去那种身份和状态。一些十几岁的孩子都成了“商人”，卖一些不怎么值钱的什物，以赚些零花钱。

俄罗斯社会从来对青少年一代的成长格外关心，为青少年学习与生活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进入 90 年代，俄罗斯政坛上风急雨骤，波澜起伏，经济领域变革急剧，问题不少。然而，与各方面的俄罗斯老朋友交谈起来，在忧国忧民的同时，朋友们总是把话题转到青少年身上。如何使青少年在校的学习不受影响？如何让青少年不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冲击？言谈话语中，俄罗斯朋友都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显然发自内心的愿望：希望今天的一切动荡和纷争能早些结束，希望伟大的俄罗斯在青少年一代手中变得安定、和平、繁荣、富足。

